



万宝水库

蓦然回首

杨世书

這本書的網址是

<http://leanpub.com/moranhuishou>

此版本發布於 2018-06-04



Leanpub

This is a [Leanpub](#) book. Leanpub empowers authors and publishers with the Lean Publishing process. [Lean Publishing](#) is the act of publishing an in-progress ebook using lightweight tools and many iterations to get reader feedback, pivot until you have the right book and build traction once you do.

© 2018 杨世书

Contents

第一章你从哪里来	1
风雨苍黄	1
白港村	3
关于族谱	5
白港山水	12
南汾村	59
祖父	65
祖母	71
父亲	80
母亲	105
继父母	118
第二章经历改朝换代的童年	129
一只老鼠大	129
最早的记忆碎片	129
山雨欲来	130
祖宅	130

CONTENTS

红色恐怖	130
这辈子第一次开会就下跪	130
祖母让我去卖油斋斋	131
田螺换米	131
巡回演出故事	131
父亲和叔父捉去坐班房了	131
祖宗有灵	132
癸巳除夕	132
第三章住庙的日子	133
住庙的日子	133
中曲多	133
禾花鱼	134
梅陶把掉了	134
能卿说三国	134
玻璃少爷	134
婶婶回娘家	135
韩素贞	135
城上姑婆	135
爸爸回来了	135
叔叔也回来了	136
发蒙	136
亦读亦耕的小学	136
大跃进的故事	136
吃饭不要钱	137
大炼钢铁	137
几位老师	137

CONTENTS

昔年小朋友	137
第四章豆芽菜	138
全县第一与差点落榜	138
这一天我走出了山沟	138
巴丘庙	139
最难忘的是饥饿	139
老师们	139
同学们	139
第五章不在病中即愁中	140
备取生	140
这本小册子害我一辈子	140
高中生活拾零	141
高中毕业证	141
老师们	141
四十年后的聚会	141

第一章你从哪里来

风雨苍黄

晏子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所以，要了解一个人，不能不了解他的生存环境。

我的故事是写给后辈看的，那是很遥远的事的了。要能让你们能够读懂，我必须先说一说我们生活的那个时代。

上个世纪，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轰轰烈烈的进行了近百年，产生了一个貌似强大的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阵营。伟人们说，沿着社会主义这条金光大道，人类就可以走向“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谁料到，八十年代末，这个阵营顷刻之间土崩瓦解。

李慎之在《风雨苍黄五十年》中说，到一九七六年为止，“共和国几近三十年的历史都可以说是腥风血雨的历史”

李慎之(1923~2003)，共产党人，1954年至1957年多次随从周恩来参加外事活动，57年划为右派，文革后以代表团顾问的身份陪同邓小平出访

美国，1985年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美国研究所所长。以他的地位和阅历，对这段历史洞如观火。

说腥风血雨，的确不是耸人听闻。1949年解放以后，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土改、镇反、三反、五反、胡风反革命案、反右、大跃进、反右倾、文化大革命，……一个个运动的结果，是冤狱遍国中，是千百万人头落地。

我们这个算是富裕的农民家庭被划为地主阶级，不仅一夜之间倾家荡产，而且三十年如一日的被专政着，过着担惊受怕备受歧视的日子。

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垮台，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明智的放弃了错误的路线和政策，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样，共和国才走出了死胡同，共产党才保住了政权。

戴了三十年的地主帽子被摘掉了，我们这个家族才脱离了苦海，逐渐恢复元气，回归寻常百姓的正常生活。

白港村

我们的故乡是江西省峡江县金江乡白港村。峡江是个小县，三国时是吴国的巴丘县，明改为峡江县。历史上，峡江这个地方，曾隶属临江、庐陵、新喻、新淦等，象屠夫卖猪下水一样，被搭来搭去。可见峡江历来是个边远的不发达的角落。

现今接壤的四县市，东北是新干，西北是新余，东南是永丰，西南是吉水。根据国家的统计，1999年，五县（市）的人口（万）/国土（平方公里）依次是：峡江16/1287，新干30/1248，永丰40/2695，吉水46/2475，新余107/3164，每平方公里的人口数依次是：峡江124人，新干240人，永丰148人，吉水186人，新余338人。

根据峡江网的资料，现今金江乡的面积为101平方公里，人口9000余人，每平方公里才90人。有人考证，汉唐时期的全国人口，最多时不超过7000万，遥想祖先开居的时候，白港几乎是荒无人烟的地方。

我在新干数十年，别人一听我的口音，常问，你是吉水人？而很少有人问，你是峡江人？可见，就是现在，峡江也没有多少知名度。

自县城去白港要西行四十里。从白港往西南二十里可进入吉水境内，往西北二十里可进入新余境内。这三县交界之处全是崇山峻岭。

白港虽小，却有一千二百多年的历史。据族谱记载，白港的开居公是王琪。他是唐德宗朝的进士，官拜承议郎国子博士。这是个什么官，不得而知。但从“敕赐终身受禄”看，其地位不低。王琪的坟墓尚在。丛林中，一个小土堆前，立着比附近的坟墓稍大些的墓碑，记不清是何年何月何人所立。每年清明，都有白港和庙下两个村子的几拨人前去祭扫，我也去过几次。

安史之乱以后，唐代长期处于藩镇割据的战乱局面。贞元十四年（公元七九八年）反叛的节度使吴少诚攻陷了淮西。告老在家的王琪从任丘（今之河北任丘市，古代名医扁鹊的故乡）携家南逃，投奔在吉州（即今之吉安）任刺史的姐夫宋兴。途经新淦（即今之新干）的黄金乡（即今之金江乡）时，就看中了这个地方。不久，宋兴任满，他们便商量着在此定居下来。几经迁徙，其后人一支在现今的庙下，一支在白港。白港人占多数。分宜也有一部分后裔，人数不多，仍很穷困，不发达。他们的家谱和白港人修在一起。

宋兴的后人定居在峡江的赣河东某地。据老人们说，王琪在河北的祖居地叫白港，为了表示不忘祖宗，他把新居地也叫白港。这就是白港的来历。后来有人曾去任丘寻根问祖，无果而返。

关于族谱

一修族谱是元朝的天历戊辰（公元一三二八年）二月。距王琪开居已五百多年。作序者是廿四世孙元春，从序言看，应是个有功名的人。但我没有仔细阅读族谱，他的事迹不得而知。

六修在一九四七年。父亲是主修，算是他对白港的一份贡献，那时，我们家有钱有势，大小事说了算，事情好办。据说办得热热闹闹，圆满成功。

七修在二〇〇七年。本来主修应是伯陶，但由于大嫂的阻扰，由别人去做了，也做得不错。父亲主修的族谱共三册，我只见过第一册。这是刻版印刷品，和铅印不同，字虽大，却看得头昏。纸质粗劣，又是半个世纪前的东西，稍不小心就弄破。所以我只是随便翻了翻。没有细读。

不知道一千多年以来，白港出过什么值得一提的人和事。但初序里列举了王琪以前的许多祖先，如秦汉时的王翦、王陵，东晋时的王昶等历史名人，都是我们的先祖。我不知道这有什么根据。

族谱修好后，按村规由每房各保管一部，当时订有严格的保管制度。但一九六六年文革时当四旧烧掉。

这里要说说什么是破四旧。文革一开始，就是席卷全国的破四旧运动，这是中央的号召，不是自发的。四旧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诸如各类书画、工艺品、古董、收藏、首饰、金银财宝、解放前的各种旧物，等等，都可能当做四旧，包罗万象，随意认定，随意抄家。在破四旧的口号下，不分青红皂白的糟蹋了许多好东西。我们家一张床上木雕的一对狮子就被当做四旧锯掉了。各类书籍，只要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的书，只要是旧书，或看不顺眼，搜出来就一把火烧了。

毛泽东靠阶级斗争治国，认为任何有人的地方都有左中右，都有阶级敌人，都要抓阶级斗争。比如一个村子，把村民划为贫下中农、地富反坏等各种成分。贫下中农是自己人，地富反坏是阶级敌人。而不能有宗族观念，管你什么一公子孙、血缘亲疏、长幼亲疏尊卑。十岁的贫下中农可以任意侮辱八十岁的地主。族谱记载的是血缘关系，无疑属于四旧，必须烧掉。除愚民（一村民）外，各房保管的六七部六修村谱，二话没说都交出来烧掉了。

本来，族谱是一个家族的历史，是应当一代一代传下去的。但在文革时期，大家都不敢冒点风险去保护它，更不要说站出来抵制。共产党对人脑的控制是非常成功的。

万幸的是，上屋的愚民保管的一部没有烧掉。他把家里的那部族谱藏在一只装满谷糠的箩

里，箩放在楼上的一只角落。一晃就是二十多年，再去寻找的时候，才发现不知何年何月屋漏，其中有一本浸了水，已破烂不堪了。

尽管如此，村民还是十分肯定他的功劳。否则，村谱无法续修了。

修族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无论东西南北都一样。这对记录历史对增强一个家族进而一个民族的凝聚力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当局从巩固政权着想，极力反对这样做，甚至把这种做法看成是封建复辟的动向。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政治氛围渐趋宽松，民间修谱很快活跃起来。在这种情况下，白港庙下两村的干部和群众便也跃跃欲试。但付诸实施却要靠得力的人。

庙下的王子根（王树民）曾任付县长，时任县政协副主席，以他的声望和能力，主持修谱非他莫属；而执笔则以伯陶最为合适。他们两人也乐于去完成王氏家族这件大事。

还有几位老头，态度也非常积极。王根香是庙下人，土改时的红人，后来官居县林业局长，在城上一带颇具威望，他是修谱最积极的倡导者，可惜他在数年前去世了。王春华，七十多岁了，是位退休老师，算是文化人，他对上次修谱也比较了解，伯陶曾邀我一起去向他征求意见，他表现非常热心，谈了一些具体的建议。叔叔也是积极的支持者，从上次修谱以来，几十年的翻天覆地，他是全过程的亲历

者，眼下苦尽甘来，后辈都有出息，虽然不是亲生，但上次已上了谱，我们对他们确也如侍奉亲生父母，能把今天的兴旺写进村谱，那是多有光彩的事。而且上次修谱，他也曾参与其事。所以，我们和他谈起修谱，他脸上都泛起红光来。

1995年清明，我回乡扫墓，这天，在梅陶家吃饭，兄弟几人谈起修谱事，表现得非常热心，都说要把村里的干部叫来商量商量，于是梅陶把宗德和春华的儿子叫来。春华的儿子，忘其名字，他当时是村里的村民小组组长，他是靠他那个大家庭人多选票多才当上的，唯唯诺诺，没有什么本事。宗德当什么我不知道，小学时和我同学，还要好，他没有多少文化，见识短，完全一个大老粗。我们把他们两个叫来，春华的儿子没说什么，宗德则专唱反调，我们说一句，他驳一句。后来我想，我们是什么人，以什么身份跟他们谈话，宗德是不卖帐才这样的。

但我们找村干部还是起了作用，我们走后第三天，白港和庙下的干部一起去找了王子根，商谈修谱的事，王子根很高兴地答应牵头。伯陶1995-4-12来信，详细的谈了他的设想，和拟定的草案，并表示义不容辞，舍我其谁。伯陶虽然踌躇满志，但还有淑英一关未过。淑英是坚决反对伯陶参与其事的，她的理由是怕惹事，担风险。淑英在文革中也受过一些委

屈，对白港人颇有宿怨。伯陶不敢违背她的意志。

后来，伯陶退了休，去了上海，事情就没有下文。我回去多次，也没有听人提起过修谱的事。周围的村子要修就修成了，惟独我们白港，这样一件好事，曩了这么多年都不能实现。人心之不齐，可见一斑。

又过了若干年，伯陶去了上海，事过境迁，他来了个一百八〇度的大转变，对修谱一事毫无兴趣了。

但事情总有人会去做，前两年村谱终于修成了。还是老规矩，各房保管一部，我们这房由忠言保管。2010年4月我回白港时，因只住了两夜，只能粗略翻了一下，总的印象，修得还可以吧。可惜没看到关于人口的统计。据我估计，目前，几个地方加起来也不过千多人。有一千二百多年历史的古老家族，人口的繁衍实在太慢了。据说，曾经有几千人的时候，不知遭受过什么大的天灾人祸，以至于现在人口这么少。

族谱上有一首辈分歌，为：朝中上圣治乘乾，世道升平产俊贤，我族人文昭穆盛，风云际会本枝绵。奕霖算“道”字辈了。据说，庙下人已有产字辈、俊字辈了。他们祖先排行在前，所以发得快。因为庙下人辈分小，白港的小孩子都是他们的爷爷。所以他们对白港人有一份后辈的情分。

若从祖父的祖父算起，我这本书讲的就是我们这一家子祖孙七代的故事了。

附：白港源流来历序（摘自村谱）

吾王氏赐姓自周始，周衰，七国争雄，吞并九有。晋七世孙翦，少好兵，事秦，始皇并吞天下，功居多，。翦子贲，事秦，封为五陵侯。孙离，事秦二世，封为武城侯。离生二子，元为琅琊始祖，威为太原始祖。传四世至陵，乃超然特出，奋然兴起，敌千万人之勇而奋勇直前，莫能与之对垒。故佐汉仇秦，大有功于汉室。遂为高祖功臣。受遗诏辅子。惠帝六年，拜左丞相，封安国侯。陵至翁孺，为汉武朝绣衣御史，有阴德。常曰：“吾子孙必有兴者。”子禁，禁子崇，以帝室懿亲，拜安成侯。崇子虎，拜大司马大将军。虎子俊，传七世至泽。汉昭烈时为江陵郡守。泽子昶，字文舒，为魏末兖州刺史，迁司空。昶子湛，字处冲，坐卧常观《周易》。故以《周易》著名。晋武朝时，人谓之“床头周易”。湛子承，为骠骑将军，后迁司空，从事中郎。豫迎大驾，此爵兰田县侯。及至元帝渡江时，名臣王导、卫介、周岂、庾亮之徒，皆出其下，为中兴第一。承子述，字祖怀，有功晋室，为元帝所重，拜中

书令。述子坦之，字文度，简文帝为抚将军，征拜侍袭父爵，及成帝，迁中书令。坦之子愉，辅晋帝，亦拜中书令。时人谓之三世中书。及以老归莫州，世子受聘理家焉。莫州，古莫（加耳旁）地，唐元宗以其字类莫，故去耳旁改莫，是为莫州。即今之河间府任丘县是也。斯时愉翁生子名缉，为晋散骑常侍。缉子慧龙，幼聪慧。愉以为诸孙之龙，故名焉。抱至君泽民之略，负敌忾御侮之才。年不过十四，遂拜宁南将军，谥曰穆侯。慧龙之子宝兴，袭父爵封长社侯，后为龙骧将军。宝兴之子琼赠，征北，封为将军。传四世至灿，娶郑氏，合葬紫金峰。灿子坤，娶宋氏，亦合葬紫金峰。

自愉至坤而生琪，为十二世孙。唐德宗建中四年癸亥，举进士第，拜承议郎国子博士。上书乞归，诏许之，敕赐禄以终身。贞元十四年（公元七九八年）吴少诚陷淮西，琪遂携家逃兵，往江南洪之吉州，同女兄夫刺史宋兴，道经新淦黄金乡崇信里柘源，乐其山水。后兴秩满，遂相与谋而咸归焉。三世怡徙居墟中，悦徙涵塘。五世孙连迪始徙城岗。为子孙久远计，春蒙先人荣叔业又徙祖居之南金坪，与祖居同作西山卯向而居之。

呜呼，皆吾祖宗积善之厚，致有今日。绳绳螭螭，簪缨书香，代不乏人。其于派系，可不勘正？使为后之子子孙孙者，知吾王氏之所自，而繁衍盛大，尊卑秩然，昭穆明白，相视

不如路人，庶不负唐太宗敕高廉定世族二百九十三姓于前也。遂因旧谱增修后之官爵行第定为白港全谱云。

时元天历戊辰（公元一三二八年）二月望日
二十四世孙元春谨撰

白港山水

白港虽历经千年繁衍，却仍是个小村子。我现在还记得解放初时各户的家长，一一回忆起来，那时才有六七十户人家，大约三四百口人。这个数字是不准确的。可能更多些。从我记事起，到今天，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白港这个小小的村庄，进步了多少呢？这个问题说来话长。若从自然风光来看，说今不如昔是不过分的。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前几年，白港是一派美丽的田园风光。

村子在一个山坡上，坐西朝东，近处是田港，有良田数千亩。远方是起伏的群山，每当日出，站在村口远眺，阳光下的群山一片灿烂。这种壮观的景致，名山胜地也不过如此。一条小河从良山蜿蜒穿过田港，常年流水碧清，鱼虾很多。一里外的东南角有一片丛林，我们叫

中曲多（多是词缀，家乡话里，地名后常加一多字），这是数百年前人工营造的风水林，古木参天，百鸟栖息，是村子的一道屏障。村前有一道围墙，围墙外一行大树，一条大道直通南北。围墙内有一个很大的草坪，既是晒谷场，也是村里各种活动的场所。村后是绵延数里的松林，一人合抱不过的古松有数百棵之多。晴日，松涛声声，荡气回肠。紧靠村后边是一个埝，也是一个大草坪，草坪里有数棵大树，当中一棵是荷树，树龄可能有数百年。这棵树旁支特别多，向四面八方伸展，形成很大的树冠，就象南方的榕树，树下是热天纳凉的胜地。绿树掩映下的白港村，六七十户人家，虽然破屋居多，但巷陌交错齐整，清洁卫生，看上去一切是那样和谐安详。

这是我回忆起来的五十年前的白港村貌。再看现在的白港村。村前的小河，原来数丈宽的河流淤塞得变成一条小沟了。中曲多的古树早被砍光了，现在变成一小块菜地。村前的围墙没有了，草坪早已被房屋填满了，村后的几人合抱的松树早消失了。埝上那棵好纳凉的荷树是六十年代就没有了。半个世纪来，村子的面积超过以往两倍，人口当然也增加许多（我不知道具体数字），新屋建了不少，三四层的钢筋水泥结构的楼房已不稀奇，但建房无人规划，新旧房屋横直无序，相互包围，实在大煞风景。而卫生无人管理，连门前雪都无人

扫，整个村子没有一条好走的路。若论风景，怎能与五十年代相比。

我也去过一些地方，各地农村大抵如此。

半个世纪来，我目睹了白港村是怎样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小河的淤塞

那条小河，原有好几处深可灭顶，流经我们村的那一段，有三座木桥，每桥都是三四丈长，走在上面，可以看见天光云影；现在虽然换为水泥桥，但桥下只有涓涓细流，只有大雨时偶尔形成洪流。自上游的良山开矿以后，泥砂下泄，不过二三十年，小河变成一条小沟，常会断流。

中曲多消失

中曲多里有上百棵古木，是鸟的天堂，也是我儿时的乐园。我们住在庙多的时候，村里就把大的樟树卖给外地人熬樟脑，但一年也不过才熬掉几棵。文革以后，就被滥砍滥伐，不知何时，我回家的时候，古树全不见了，呈现在眼前的是一片菜地，种着寻常蔬菜。

松林的毁灭

村后那片松林，绵延三四里，都是合抱不过的老树，解放前，有严格的村规，保护很很好。1957年卖给国家做铁路的枕木，砍了一批，1958年吃食堂，当柴烧砍了一大批，后来是乱砍乱伐，最后是一棵不剩。好在近年植树造林，又栽上一批，可望在数十年后，能恢复的原来的样子。

承庆堂拆掉了

值得一说还有祠堂，村里人叫它“众厅”，那是明代的建筑。白港座落在一个山坡上，众厅则位于村中央，分为上中下三进。单是那几十根比水桶粗的柱子，就可说明它的规模之大，而上厅挂着的黑底金字的“承庆堂”大匾，更显示它的恢弘气势。众厅前是一片大草坪。连着广阔的田野，向着连绵的远山，古老的众厅象一位巨人矗立着，阅尽五百年人间沧桑。世世代代以来，众厅是白港人的大舞台。我自一九六二年外出求学，在家乡呆的时间很少，对以后发生的一切，自然知之不多。而五十六年代在众厅上演的一幕幕悲喜剧，我还记得不少。

由于疏于管理，几十年来，众厅渐渐破损，但

架子还是挺拔的。倘若肯花一笔钱全面修葺一番，仍是很好的。而且是文物一级的建筑，很值得保留。可是，当权的年轻人不作如此想，前两年把它拆了，在原址上新做了一栋房子，作为新祠堂，我总觉得不如老屋好。社会在急剧的变化中，随着人口的城市化，农村将不可避免的逐渐萎缩。我不知道下一次修谱的时候，坚守故土的乡亲还有多少。

父老乡亲

解放初，白港有多少人口？我没有具体数字。但我对家乡是熟悉的，一户一户的回忆起来，大抵有六七十户人家，约三四百人。解放初，方圆100平方公里的城上乡（现在叫金江乡），远远近近散布着数十个村子。我们白港还算是个大屋塘。屋塘是村的意思。村子无论大小，都是有水塘的。有屋有水塘，就成了一个村子。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解放前，白港是个偏僻闭塞的地方，多是文盲，没见过世面。所以大多老实本分，没有大恶人。我是白港的一份子，从他们身上，能看到自己的影子。

不知从何时算起，白港分为桥、东、子、槐（音）四房。我们是槐房，我们的祖宗是小儿子这一支，发得晚，所以，同龄人中辈分最高

的是我们这一房人。按辈分，我是许多人的祖父、曾祖父。

所以，尊长公出在我们这一房。尊长公是村里辈分最高而年龄又最大的那一位，主持一村的公共事宜。老尊长公过世后，按辈分年龄产生新的尊长公。最后一任尊长公是家传的父亲，名字我忘了。

后来解放了，共产党不允许那一套，村里的领导当然是共产党了。

土改时，政府根据占有土地财产的多寡，按比例把农民划分成各种阶级成分。包括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地主等。其中中农又分为上中农、下中农。贫雇农，或说贫下中农是农村的领导阶级，地主富农是阶级敌人。后来敌人中加入反革命、坏分子，称为四类分子，反右后再加入右派分子，称五类分子。文革中称黑五类。白港有两户地主，四户富农，除能卿外，都在我们槐房。

下面是我记得的每户的概况。自我外出读书后，对家乡渐行渐远，比我晚一辈的情况就知之甚少了。

体仁，我们祖父。解放初我们家是12口人。

近仁，近仁是我们的二公。二公和祖父是堂兄弟，他们的父辈是亲兄弟。我们两家最亲近了。直到现在，婚丧嫁娶都是在一起，分不开的。

二公有四个儿子。分别叫佳言、利言、忠言（万仔）、洁言（桂仔）。解放初时，佳言、利言已成家，所以他们家实际上是三家，共有10人。二公身材高大，是个忠厚人，不过多有几亩田，合到标准，划为富农。他是个糊涂虫，耳背，又喜欢发表意见，叫人云里雾里，不知所云。所以说话没人听，村里人叫他“都宝”。所谓都宝，就是象猪八戒那样喜欢发牢骚的人。他死于中风，活了七八十岁。二婆先于二公去世。六十年代的一个夏天，中午，突然剧烈的腹痛，到黄昏就死了，家人认为是绞痧症，用过一些土办法，无效，卫生所的医生来打了个转，也认为是绞痧症，束手无策。是急腹症还是心肌梗死？都有可能。

他们家的房子颇富实，但通风和采光都不好，常年有一股阴气，加上此前不久，老二利言暴病而死。所以，都认为他们的房子不好住。

佳言是老大，象他父亲一样，身材高大笔挺，倒老年也仍象个军人。他也是个糊涂虫，其实他们一家都是那样一类人。佳言一生的命运可谓悲惨。

他从小死了娘，因与后母合不来，新婚不久就离家出走，跑到赣南进了蒋经国办的什么青干班，他对这段历史津津乐道，不厌其烦。据说，王升是他的班主任，他还抱过王升的儿子呢。王升去台后当了上将，一时成了炙手可热

的人物。因此堂叔常说：“要是去了台湾，我现在也是个不小的官了。”

然而，在逃往台湾时，他误了船，结果当了俘虏。不久被调往朝鲜，参加抗美援朝。乡政府曾敲锣打鼓给他家送去荣誉牌，“光荣之家”四个字金光闪闪。那时全家不知有多荣耀，连我们也感到沾了光。谁知才过两个月，又传来任人意想不到的消息，说佳言当了反革命，捉去坐班房了！于是二十才出头的妻子便成了反革命家属、富农分子。过了几年，妻子改嫁于本村的生言。

坐了15年班房回来，已是五十挨边，两鬓斑白。或许是老天眷顾，妻子后嫁的老公生言，于前不久中暑身亡，通过亲属撮合，他们得以破镜重圆。谁知由于他们原本没有什么感情，复婚后妻子的心都放在几个孩子身上。因此，两个人总是合不来，不到二三年就又离了。

后来，亲友劝他再找个女人，但他有个必备的条件，就是再娶的女人要有生养。你想，年过半百，又是个劳改释放犯，他提的条件很难满足。就这样，他到老是孑然一身。

每年回到老家，我都有机会跟他聊天。他对我们一家很有感情，常会来我们几兄弟家坐坐。一到冬天，烤火要烤到半夜。但他非常演文（讲客气），他是很少吃别人家东西的。你执意要他吃，他起身就走，拖都拖不住。这种

性格太迂气。有时令人讨厌。后来我发现，我们一家人包括我自己也都有这种毛病。只是没有他那么突出。拒人于千里之外，往往得罪人，往往失去朋友。

他是国民党的遗老。喜欢打听台湾方面的消息，喜欢谈政治，社会上的事知道得不少。常常聊着聊着就大发牢骚。不过牢骚归牢骚，他不是真的忧国忧民，说说而已。他好象不太会愁，能吃能睡，一着枕头就能鼾声如雷。所以，八十五六的人，身体仍然硬朗，仍然田里地里，终年劳碌。

我曾经问过他，为什么在朝鲜做了反革命？他总是大喊冤枉，辩解说：“什么反革命，不过是和几位战友骂了连长，就把我们关起来。”是不是如此简单，我不得而知。上世纪八十年代平反冤案的时候，亲友们都提醒他，既然是冤枉，为什么不去找上面落实政策呢？可是，他连当年部队的番号都忘了，找谁去？

佳言是个见过世面的人，可惜他没有脑子，糊涂一世，所以不能怪上天对他不公。比如，他去了台湾，或是在志愿军里好好混，或是复婚后好好过日子，或是离婚后凑合着再找个女人，会象现在这样孤苦伶仃吗？

他一辈子都很凄凉，晚年就更不用说了。我们都很同情他，但爱莫能助。

2008年，姐姐去世的时候，我和伯陶去看他，想一人给他100元钱，表示一点心意，不巧他

关了门出去砍柴了。

2009年，浩正回峡江参加毕业20年集会，听说他死了。留下二万多元现金，凄惨的死了。

利言，二公的老二。大约是56年或57年夏，在送公粮的路上中暑，暴病身忘。才二十多岁。当时完公粮要各家各户送到县城去，肩挑车推，在通往县城的路上，浩浩荡荡，是当年的一大景观。那时还没有通县城的公路。

有人说，利言是死于缩阴。缩阴，就是阴茎往腹内缩，等到完全缩进腹内人就死了。中医有此一病，但我从医这么多年，从未见过。阴茎往腹内收缩的情况是有的，但没听说谁死于缩阴。民间传言，只要妻子肯用嘴含住丈夫的阴茎，丈夫就不会死。无稽之谈。

利言死后，老婆嫁给了本村的明达

利言留下一子一女。儿子叫火仔，和我同年，是儿时的好朋友。他从小就调皮，有几分蛮横，不服管束。父亲死的时候也十二三岁了，他好象死的是别人的父亲，竟笑着说：“去看近仁死崽哟。”

因为是富农的儿子，而且父亲早亡，家里穷，火仔一直找不到老婆，快三十了，才娶了一个吉水女子，一个嫁不出的心脏病，终于死于分娩。续弦也是吉水女子，比他大好几岁。当火仔还很生龙活虎的时候，妻子就象老婆子了。一连生了4个女。因为没有儿子，火仔总觉得

抬不起头，曾托我在新干替他抱养一个男弃婴，这到哪里去找呢。他自己没有儿子，却死活要过继给佳言，说起来有些滑稽。而佳言看透了是想继承遗产，并不会关照他，所以死活不答应。

火仔和大家庭里的关系不好，喜欢胡搅蛮缠。他这一辈子也值得同情。

利言的女儿叫水英，乘佑叔介绍给他的同事邹勃生，邹大十几岁，一时被当做笑谈。后来生儿育女，有个不错的家庭。

忠言，二公的老三。比我大三四岁。

他给我最早的印象是涎吃。涎，就是馋的意思。

土改以前，我们家还开着一家小药铺，或者说一家小诊所。药铺里兼卖百货。忠言不过十岁左右，他常出现在药铺的门口，把根手指头含在嘴里，望着货架上的那些点心流口水，一站就是老半天。黄先或是周先，看他馋得那样，便拿了点什么可吃的东西逗他，他马上又一溜烟跑了。他并不奢望能吃到什么，不过为了一饱眼福而已。他的家就隔一条小巷，说不定过一会又来了。

1962年，他二十出头了，也是因为出身的问题，尚未找到老婆。那一年，因为饥饿，湖南有许多女子跑到江西来找老公，为的是不挨饿。夏天，有三个湖南女青年找到白港来。其中一个

就找到忠言。女子人品不错，年纪也相当。在他们家住了一夜。不知哪一点不合她的意，那晚穿了几条长裤睡觉。天那么热，不知她怎么受得了。一清早，偷偷跑了。有人见了，要忠言快去追赶。忠言是个老实人，不愿勉强她，放她走了。留下来的两个，一个是我二嫂，一个是财根老婆。她们都已儿孙满堂，有一个美满的家庭。

忠言现在的妻子边平华是王平原的前妻。王平原在剧团里爱上了姚惠兰，把她离了。

人如其名，忠言是个老实忠厚人。生有五个儿子。老大秋苟考取北大，一时轰动一县。他填报的志愿本不是北大，也不是志在哲学。因为他考分高，而北大哲学系又无人填报。地区招办擅自作主，替他改报北大哲学系。地区为了招生考绩，不征求本人意见，是那个年代才能发生的事。这一改其实是害了秋苟。秋苟本分木讷，不是搞政治的料。当不了官。不如搞专业，能发点小财。毕业那年恰逢1989年动乱，大学生分配遭受冷遇，分到县里都进不了县中，幸好后来分到地区党校。娶的老婆是吉安商店里的临时工。本来，在党校接触的各级领导很多，活的人早就捞到一官半职了。据说现在进了井冈山政治学院，那是直属中央，几乎和中央党校一个级别。在那里当个教员，倒也还马马虎虎了。以后发达起来也说不定了。

洁言，二公的老四。比我大一二岁，或者差不多。身材魁梧，象个军人。可惜脑子简单，日子就过得不活。前几年，他老婆得了胃癌，已经很晚期了，由伯陶出面，请中医院的宋裕民开了刀。结果人财两空。其实用钱不多，但一下就弄得非常窘迫。季陶出于同情，动员我送点钱给他，不过他不说我也会送的。我送了50元。别人的帮助总是有限的。

轻张大(da，读第三声)，和祖父一辈的人。这是他的浑名。人极瘦，却很结实。村人就把他比做轻张。轻张就是白鹤。他说话喜欢带个尾音“大”，所以全村人都叫他轻张大，以至于我忘了他的真名。他长着两只招风耳，天生一副说相声的幽默脸。他单纯乐观，幽默。和他在一起劳动会有很多快乐。他活到七十多岁。他没有儿子，好象连女儿也没有。由弟弟过继了乘言给他。乘言比我大一二岁，和我小学同班毕业，我们感情也很好。他的字写得不错，学习本来也不错的。可惜没有考取初中，从此就作田到老。他的身体不好，总是瘦而黑，我曾对他说，和老婆分床睡嘛。他摇摇头，笑着说：“没用。我试过。你还没结婚，不懂。睡到半夜又会爬过去呀。”

赌客，是轻张大的老二。矮子，嗜酒而好赌，所以全村人都这样称呼他。我因此也忘了他的本名。他的大儿子青爱当志愿军死在朝鲜。

所以他是烈属。妻子死得早，小儿子又早过继给了轻张大。他性情豁达，想得开。常见他拿着一根长烟管抽烟，在四处悠闲的走来走去。他打了多年光棍，后来他从吉水娶过来一个地主婆。赌客活了七十多岁，一生也很凄苦。后妻比他小很多，活到90岁。靠烈属的关系，她的晚年倒活得不错。

青爱高小毕业，当时算是知识份子。参军以前，他曾差使姐姐给他送过一封私人信件，我也跟着去了。那时，谁都可以对我们发号施令。信是送给七八里外的吼山傅金根的哥哥。走到半路，姐姐把信拆开看了。好象写的是什么“我好想你哟”之类的废话。

德言，和我们是一房。会打（武打），有点工夫，性子刚烈。土改刚刚开始，还不算太激烈，村里斗他，他回到家里，提起一壶滚烫的水大口大口的喝一顿，活活烫死了。我没有见过他的面。不过五六十岁吧。卓然和勃然是他的两儿子。

卓然，德言的老大，有些狡猾。

卓然是富农，和彩凤是连襟。他的老婆在土改中因被斗吊死了。后娶的女人是个淫妇，性生活不知足饱。卓然死后她又和一个裁缝同居，裁缝更满足不了他，留下许多笑话。卓然在1957年暴病身亡，人们认为娶坏了老婆，把身子抽空了。

卓然的儿子叫新夫仔，非常调皮，都说剥了皮也会跑。彩凤对这个沦为孤儿的姨外甥颇为关照，让他学泥水匠、铁匠、学木匠等。都不服师傅管教。文革中和吉安的一个知青结了婚，随妻子到吉安落户了。每年会回乡扫墓，总是穿戴整齐，头发梳得流光，象个小老板。勃然，德言的老二，也是富农，言语不多，非常老实的一个人。读过几年书，到后来几乎一个字也认不得了。他小时候玩耍的时候，一只眼对着门上的洞眼看人，被门外的玩伴用一根柴枝戳瞎了。

一个老实不过的残疾人被当成阶级敌人管制了几十年。直到摘帽。

勃然老婆和婶婶是好朋友。婶婶借了他们一只碗橱用，一借就是几十年，后来好象给了点钱买下了，用到婶婶去世，才劈了当柴烧。

依仁，和我们是一个房，是祖父一辈的人，死得早，对他没有什么印象。他的老婆我们喊依仁婆婆。一个矮小的婆者。我还在桃溪的时候，一年回乡过年，婆者病得很重，坐在火炉边，头低得无法抬起来，这是元气极虚的表现，我给她打了青霉素，开了人参，居然好了。于是请我去他家吃了新年酒。新年期间的饭叫新年酒。依仁的女儿女祥和小学同班，比我大两岁，有个时期象姐弟一样亲热。女祥嫁的老公叫润全，是庙下人，红脑壳的养子，当过

志愿军，后来担任了多年的支部书记，身材高大，肩宽胸阔，是个美男子。可惜徒有其表，没有什么能力。改革开放以后，家家都富裕了，他家却很穷。50多岁的时候中了风，晚年就很惨喽。

和言，依仁的老大。我还记得他那个老实巴交的模样，二十多岁的时候得了急病，去县医院住过院，在回家的路上落的气，于是他就进不了村，棺材放在马路边。

老二的名字记不起来，小名叫老蠢子。同样是老实人。

德昌，是我们一房的，和我们同辈，不太直爽，当过队长。一个独子叫金根，比我略小，十多岁就死了，几乎收了他们夫妇的命。妻子患肾性高血压，常年在病中。他们夫妇晚年都很惨。

俊昌，德昌老二。比较稳重忠厚，当过村里的保管。对我们家能关照的地方会给予方便。在大哥出世以前，祖父曾打算把他过继为孙子。

禄昌，德昌老三，比我大一二岁，独眼，老实本分，小学同学，学习还好，尤其字不错。在我从医以前，大约六十年代，患钩虫病，腹痛，严重贫血，做胃病治，展转医治，差一点治死了。

祥言，本家。他父亲叫求仁，我从未见过，不知何时亡故。他母亲我们叫求仁婆婆，非常矮小，嘴巴却很厉害。有一次，我不知为什么事去找祥言婶婶，看见她就问：“你们家没有人？”小孩子不会说话，我的意思是问祥言婶婶在不在家，却说成“你们家没有人”，老婆者大概认为我的话不吉利，一听气得破口大骂：“你瞎了眼，我不是人?!”吓得我面红耳赤。那是我七八岁的时候。

她活了七八十岁。

祥言是独子，对母亲没有孝心，母亲常骂他是猫牯鸟。猫牯鸟就是猫头鹰，传说会吃娘爷。祥言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嗜酒，一醉就发酒疯。有一次和母亲对骂，母亲骂他猫牯鸟，他就骂老鳖，骂到起劲的时候，搬了一个篮球大的石头，嘭的一声就把锅砸了。看的人直吐舌头。

祥言只有一个女儿，父亲在东北劳改的时候，因为生活困难，由祖父做主，把梅陶送给他做儿子。他白得了一个儿子，却抱怨我们家连累了他。68年秋，我在南昌胃穿孔开了刀，父亲急得要死，问他借点钱寄给我，他不但不借，还愤愤的对他人说：“还借钱给他，害倒被他们害死了!”他因我们家受委屈的事是有的，但能怪我们吗？那一年他新屋落成，宾客满堂，父亲经过他家门口，他装做看不见。父亲非常伤心，对我们说过许多回：“一个儿子

白给他们了！”

要知道，那个时候已是文革后期了，不存在划清界线的问题。

七十年代某年，祥言突然瘫痪，以当时的医疗条件，尚不能明确诊断，我开过几个方子，自然是没有效果。不久，他吊死了。

祥言婶活到八十多岁，前两年才去世。

星彩，本家，和父亲一辈人。家境尚富裕，家庭成分是富裕中农。少言寡语，老成持重，他是有些城府的人，都说他奸，无非自私一点而已。我们是一个生产队的。他只有两个女儿。禄昌是他过继给他做儿子的，好象相处不来。因此常为没有亲儿子垂头丧气。他的老婆是结巴子，嘴巴厉害，一队的人都怕她。她是得子宫癌死的。星彩活到八十多岁，还在田里劳动挣口粮。因为没有儿子，自然凄凉些。

日华，日华、春华、桂华是三兄弟。还有一位兄弟在担泥坑。和我们是一房，但隔得较远。日华是梅陶的丈人。大跃进的时候在养猪场养猪。养猪场办在模范里小学那边的田港里，由他们一家子管着个大猪场，吃住都在猪场里。日华会巴结，在那个时候入了党。也的确捞了些油水，但那个时候的油水是极有限的。不料到了1965年四清的时候，查出了贪污，党籍被开除了。接着文革开始了，又说他是漏网富农（或是漏网地主），要升他的阶级。谁都

知道升阶级意味着什么，他吓坏了。一天，他独自拿了根扁担到棚下去，说是去砍柴。谁知他吊死在棚下。不久，又斗他妻子，妻子也吊死了。留下一对小儿女。夫妻都不过50上下。日华有点驼背，解放前家境比较富裕，据说祖父很赏识他。他的妻子很有人缘，口甜，对子女管教严格。梅陶老婆讲话嗲声嗲气，就是受母亲的影响。

春华，他是小学老师，57年，在砚溪小学当校长的时候划为右派。他一个农村小知识分子，懂什么政治，不过说了几句不合时宜的话罢了。因此在家作了20多年的田。他做梦也不会想到，后来落实政策，改正了右派问题，补发了工资，还安排了一个子女顶替当老师。那个子女是个拐子。当时退休有顶替的政策，不少人都挑选有残疾的子女去顶替。他拿着退休工资养老，衣食无忧，在农村，算是过神仙日子了。他夫妇都活到七八十岁。

桂华，解放初，他还很年轻，一个朝气蓬勃的小伙子，说话嗓门大。大约1960年前后，因男女关系坐过牢。当时，我觉得这个人真无耻。后来，我发现这种事在白港并不稀奇。解放初，婚姻法一颁布，一夜之间就有许多家庭重新组合，在此之前，不少人除了妻子之外，都有相好。

自来，是本家。我们称呼他“自来叔”。解放前常在我们家里混，原来祖父颇看得起他，所以土改时别人叫他狗腿子，他也不在乎。他的老婆是祖父替他找的，叫友妹仔，在我们家做伙头。自来嫌她是蠢婆，感情不好，一解放就离了。

其实，自来早就嫖了寿兵的老婆，生了一群儿女。因为妻子是寿兵的，所以儿女也都是寿兵的。解放后实行婚姻法，寿兵的老婆名正言顺的成了自来的老婆，并把最小的女儿判给自来，算是回报吧。其实，全村的人都知道所有的子女都是自来的，子女们也都承认。

后来自来招了一个吉水的泥水匠为上门女婿。自来叔嗜酒，天不管地不管，不知愁为何物，经常醉得象个关公。他真是个醉生梦死的人。后来得了高血压，不醉也是关公脸，又有慢性眼险炎，俗语叫烂眼沿。所以形象不雅。他喜欢讲高力士替李白脱靴之类的故事，对白港的掌故也知道甚多。晚年得了痴呆，一天到晚瞎忙，拿把锄头这里挖挖，那里挖挖。也活到七八十岁。

自来婶是个比较贤惠的人，说话轻言细语，使人听了喜欢。对我们家还是颇有感情的，对母亲和婶婶喊“嫂嫂”喊得很亲热。

家传，他的父亲是村里最后一任尊长公。尊长公是全村辈分最高而又年长的那一位，是自然

产生的。有关村里的一些公共事务，都由尊长公管理。这是老规矩，大家都会服他，所以管理也是有效的。

我没见过这位尊长公，只看见他的灵柩放在众厅（祠堂）里。那时已经解放。

家传只有一个女儿，叫竹英，人长得漂亮，性格也温柔。和我同班读到初中。那时同班的王平原已去县剧团演戏。他把王竹英介绍给美工江叔华。我看见过江给竹英画的一张头相，挺象的。江是永新人，家里是地主，竹英的母亲死活不肯。他们的恋爱经历了一番曲折的过程。因为恋爱，对学习自然影响不小，竹英没有考取高中。据说竹英从来没去过永新婆家。做个地主多可怜。

我曾听说，他们家曾经希望把我过继给他们做儿子，不知为什么没有成功。后来江叔华的儿子就做了家传的孙子，我看见竹英母亲的墓碑上就是这么刻的。

家传瘦高个子。眉目清秀。60年代，家传因男女关系坐过牢。

那是个晴朗的夏日，我看见他扛着一根禾担出去砍柴，后来知道是去偷情，结果被活捉。就为这点事坐了一二年牢。那个年代对这类案件判得很重。

家传的妻子死于肺结核，家传单过了许多年，老了以后就住在女婿家，活到八十多岁。

江叔华退休后，他和几个退休老头自筹几十

万块钱，用几十吨各色石头塑了一个邓小平的像，上了吉尼斯记录。但一直找不到买主。不久江得了鼻咽癌，不知现在尚健在否。

生言，大个子，可能有一米八，这在农村算得上是巨人。但很笨拙，做事又毛糙，在队里劳动只能吃到9分，不能吃10分。那年暑天，和又陶去新余买水缸，走到王户坳中了暑，昏倒在地。又陶准备回家去叫人来，怕路人掏去他身上的钱，就伸手到口袋里替他取出来。他以为又陶是乘机打劫，大喝一声：“你敢扒我的钱啦?!”两只眼睛瞪得有灯泡大，把又陶吓了一跳。又陶跑了十多里路到白港叫人去抬回来。等人到时已经死了。大概不到50岁。他的原配离婚后嫁给了生云，而他娶了佳言的老婆。他死了以后，那个女人又和佳言复了婚，但没过几年又离了。

用财，裁缝，一个小老头，驼背，面黄肌瘦，五十多岁就死了。他的老婆因腰粗，人称“桶箩仔”。桶箩，比装谷的箩小一点的一种箩。叔婶曾和他们邻居多年。桶箩仔心肠还好，直道善良，肯说公道话，对我们多少有些同情。他们有两个儿子，一个叫乾乐，一个全仔。乾乐在文革中曾起劲地要打父亲。

那是1968年春，我从中医学院回到家乡，一天，我正和父亲闲聊，乾乐气势汹汹地来到家里，指着父亲的鼻子，骂道：“雅言，你这个叫花

子，依老子的脾气，今天要打死你！你好大的狗胆，把祖坟送人，你赶快死得去替我去把那座坟挖了！”说着，甚至把拳头都挥过来了。事情要追溯到解放前。老姑父的父亲死了，他们看中了一块坟地，那块地在白港人的山上，就问父亲要。那时父亲说话算数，看在亲戚的面上，就答应了。这事是父亲的错，早就挨过人的骂。文革中，乾乐又把这老帐翻出来，他不过一个平头百姓，不知代表谁。我远道回乡，他看都不看我一眼，更不要说打招呼。他料定我们不能拿他怎么样，所以敢当着我的面如此放肆。

我的确不敢做声，只好看着父亲唯唯喏喏的扛把锄头上山去把那座坟的墓碑挖了。

若干年后，父亲和叔父就埋在那座坟的旁边。被父亲挖掉的墓碑，早被坟主重修了。看着这一切，我感慨良多。

全仔，人称全仔麻子，和我年纪差不多，一起读过书，算是儿时的好朋友之一。一个脑子简单的人，好管事，曾当过村干部，但只是人云亦云的傀儡。他不到六十岁就死了。

开文，和祖父一辈的人，本家。富农。他们有一栋很结实的砖瓦房。进到那屋里，四壁墨黑，少有人气，显得有些阴森。两老我都见过，印象已十分模糊。他们只有一个儿子，是个殷实之家。但土改时没有怎么触动他们，不久两

老就都死了。儿子王乘佑，是我的小学老师。教数学在县里有些名气，文革中吃了苦，在家里劳动了好几年才恢复工作。

富达，干瘦干瘦，有几分幽默的人，还善良。老婆是蠢婆，来宾和她长期私通，尽人皆知。人们逗她，她便乐于说出许多细节。有人问，他给你钱没有？她生气地说：“没有，没有，该只鬼打个，把我蚊帐袋里的两块钱都拿走了！”他们的大儿子腊庆，和我小学同学，学习不错，但老实本分无用。二儿子在恢复高考后考取了杭州一个什么大学，学财会，是继我之后的白港第二个大学生。他在一个大型企业里管财务，颇吃得开。曾开了小车子接富达去住，富达可得意了。他这个儿子算是白港出的一个人才。据说新版县志把他编进去了。富达两夫妇都活到八十岁。

明达，富达的老二。他做过道士，不知道是怎么学来的。解放初常看见他做法事，搞一些做神弄鬼的迷信活动。每个地方都有这样的人才。他还会演湖南花鼓戏。在众厅里，搭个小戏台，穿一身戏袍，哼几句，扭几圈，观众也有一二百。我看过一二回。那个时候实在没有别的娱乐活动。这样的演出也是很受欢迎的。他身材不错，只是烂眼沿，坏了他的姣好的面容。不知道他以前是否有老婆。利言死了以后，他的老婆就嫁给了他。

芝腾，极矮，接近侏儒，大家都叫他“矮人国”。他的老婆、儿子财云夫妇以及孙子，都矮。他们家真是一个矮人国。芝腾的老婆原是婪山村有夫之妇，芝腾先是嫖了她，先奸后娶，带了肚子嫁到白港来，白港人不承认财云是他的种，所以财云没有上村谱。这是才云最没脸面的事。其实财云和芝腾是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极象，不是芝腾的儿子是谁。正因为财云不被白港人承认，芝腾过继了一个侄子做儿子。这个人叫哭珠仔，是圣之的弟弟。芝腾夫妇心肠还好，对四类份子不象有些人那样恶。

芝腾老婆子还曾想给我做媒。

1968年春，我从学校溜回家，为的是逃避那无休无止的文化大革命。一天，我正在床上躺着。芝腾婆者兴冲冲来到家里，屋里暗，又隔着蚊帐，她不知道我在家。我听见她神秘兮兮的对婶婶说：“启元村某某的儿子在部队入了党，以后望提干，因为未婚妻是地主，就回来把婚退了。我看正好哇给秋陶，包会同意。听说劳动力好得很呢！”

芝腾婆者说的那个当兵的，是我小学同学刘启华，没考上初中就当兵去了。

婶婶不高兴，心想，秋陶是大学生，总不能找个文盲呀。于是回答她：“秋陶还在读书，暂时不哇老婆。”

在那年头，不怕你是大学生，在世人眼里，你

是地主，就只配娶这样的老婆。

在学校混了几年，本事没有学到手，今后是否有工作分配，渺茫得很。在那种境况下，我没有觉得人家看轻了我，倒感激她一片好心。

过了两年，芝腾婆者找我看病，一个乳房肿块累累，显然是乳腺癌。不久就死了。

财云，芝腾的儿子，当了很多年的生产队长。他经常会去公社开会，每年还去县里开一两次三级干部大会。因此，在社员眼里，他是官，都怕他。那时搞集体，吃大锅饭，一个强劳力一天只能挣几毛钱，干活谁有积极性？一个生产队二三十号人在一起，偷懒的多，磨洋工的多。妇女丢下手里的事不做，聊起天来没个完；男人拄着锄头把抽烟，一歇就歇半天；党员不是带头苦干，而是挑快活事干，象明凤，经常扛把锄头看看水；只有象又陶那样的人才踏踏实实干。才云怎么管呢？他一边干活，一边骂人。“你娘卖屁个，站在那里一桐树样，会累死你呀！”“你个叫花子，就晓得偷懒，依得脾气，老子宰你几拳！”粗话脏话，骂骂咧咧，张三李四，不讲情面，好象父亲对待儿子。大家也习惯了，都服他。因为没有这样一个人不行。

我常参加队里劳动，对这种场面记忆犹新。

不过，才云人是一个好人，一不贪，二不偷懒，作风正派。老婆叫凤英，是妇女队长。那时干

部偶尔占点小便宜而已，决没有象现在那样贪污盛行。

甫云，他们都是子房。甫云一解放就是干部，比较温和斯文的一个人，当过多年的治保主任。治保主任是管治安的，说白了就是管地主富农的。他对地富不是那么凶神恶煞，多少有点人情味。是个温和派。他的母亲是个寡妇，和一个分宜人姘居，住在庙里很多年。甫云现在也七八十岁了。我觉得他是个好人。

生云，又高又瘦的一个人，两只脚象耘禾棍子，看起来不堪一击，却常以打师傅自居，吹嘘有什么什么本事。老婆无生养，婚姻法一颁布，就把老婆离了，他老婆后来嫁给怡生，生了一群儿女。生云娶了生言离掉的老婆，照样没有生养。

生云50多岁就死了。后娶的老婆模样还不错，待人也温存。晚年一只脚烂了一个大窟窿，找我看，可能是癌症，生云过继了弟弟发云一个儿子，待她无良心，所以可怜得很。

发云，不怎么严重的驼背，当过多年的大队党支部书记。有一年春节，我们几兄弟和父亲去村后的山丘上出行，不过是散散心。那是一片茶林，是祖父开荒种植的。解放后分给了贫下中农，到现在六七十年了，还是全村茶油的主要产地。他为了邀功请赏，杜撰我们父子是去

看山，记变天账，汇报到公社，又上报到县里，成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还有一件令我切齿痛恨的事。

1964年暑假，学校发给每位学生一张鉴定表，要求大队对学生暑期在家的表现做一个鉴定。发云竟在表上填“同意该生回家作田”表填好后交给四仔转给我。四仔把这份表交给我的时候，有几分尴尬。我没法，把这份表老老实实的交给了学校。学校当然不会理会大队的意见。为了让我消除顾虑，万鹤年主任多次安慰我，要放下思想包袱，轻装上阵。

发云料定我只有任人宰割，奈何他们不得，才如此露骨，一点也不遮掩。他们不仅猖狂，而且极其愚蠢。

他50多岁时死于肺结核，一下台就无人睬他。我真想辱骂他一顿。可惜，当我敢这样做的时候，他早已见阎王去了。

方云，他的父亲我忘了名字，一个驼了背的瘦老头。他常讥笑儿子没有用，和老婆睡觉冒个屁久。他年轻的时候，夜里收工后还走十多里去柘泥坑嫖野老婆，一夜搞几出。这个老头好笑。

方云不过二十来岁。青爱在朝鲜牺牲后，他的老婆就嫁给了方云。但方云不久就得了一种怪病，还去过南昌。他的一只眼睛肿得鼓出眼眶，比一个桃子还大，看了吓人。很可能是

脑肿瘤。

有云，凡带云的都是他们子房人。他们夫妇都死得早，印象很模糊了。他们留下一双儿女。儿子叫香根，调皮极了，从小在外头打流。

圣芝，他是云字辈的下一代。他父亲死得早，名字忘了。母亲得了肺结核，瘦得不成人样。她给圣芝带小孩。用嘴嚼了饭，再抠出来撮了给毛毛吃，令人恶心。不过农村以前都是这样喂小孩的。

圣芝出了个有出息的儿子。初中没毕业，在深圳打工，在学到了技术和有了销售网之后，携款而逃。背着老板另起炉灶，据说有了几百万的资产，开着小车子荣归故里，成了白港首富。

知达，曾在我们家做过长工。他和达相一起上山砍柴，一只豹子把他扑倒在地，达相见状就逃，老虎丢下知达而去抓他。最后是知达救了达相一命。

知达四十多岁就死了。留下一儿一女，曾住在学堂多。他的儿子叫想得，是我儿时的好朋友。他们夫妻没有生育，在外头抱养了一个男孩。

友爱，两夫妻都是大个子，友爱脑子简单，有几分蛮，老婆世故些。因为是邻居，又是同一个生产队，和我们一家关系还好。他们两夫妻

都在五十多岁时死于中风。

仁爱，大个子，身板挺拔，象个军人，豪爽，但懒惰，好酒，常发酒疯。最善于都脚鱼（都就是叉的意思）。过去小河里脚鱼多，仁爱懂得脚鱼的习性，他沿着小河一路走去，根据河面的动静，他能准确的判断哪里有脚鱼在活动，一把叉都下去，十拿九稳。他这点本事是出了名的。

两夫妻都是大个子，生的儿子也一样，但银样蜡枪头，冒用。

祝安，王道章的父亲。他有眼病，王道章在南昌文艺学校学习的时候，曾把他带去住院治疗。不久我们母亲也病了，她老人家却不能去南昌治疗，想到此我常很惭愧。祝安性格温存，有点象女性。

王道章比我高一届，读了吉安师范，毕业后当了小学教师，后来调去省文艺学校学放电影。当时放电影比当老师要吃得开。后来调去文教局当会计，直到退休。他为人还正直朴实。虽然交往不多，我们始终还是保持了朋友的关系。我退休前，他从峡江特意来找我，他患胆结石，峡江医院建议开刀，问我开还是不开。我建议他暂缓。但后来没有采纳我的意见，去南昌开了。后来我想，我的意见是不对的，开比不开好。

永康，祝安的老二。他在50岁多岁的时候死于肝硬化。他们两家在王道章这一代，堂兄堂弟之间矛盾很大，几乎是死对头。

永康有四五个儿子。老大叫道爰。因为他头大，脾气又丑，我们都喊他雷公菩萨。他一直在商店里卖东西，当过合作社的主任。老二叫道渭，小学同学，很老实。我们关系很好。他参过军。退伍后分配在九江炼油厂，他嫌离家太远，去了商店。到改革开放后，商店里混不下去，回家作田了。老三叫三阳，当了黑虎村的支部书记，后来又进了乡政府。他算是捞到了一些油水。那年梅陶要求入党，因他反对而没有入成，据说理由是叔叔在解放前曾经打过他父亲。是否有此事，不得而知。冤仇难解啊。

影求，和赌客他们是一大家。他是个孤老头，老烂脚。他给我的印象，是颤颤巍巍的一副可怜的样子。一个下雪的冬夜，外出解手，失脚踏在沟里，许多人听见他喊了一夜，却无人去拉他一把。结果冻死在沟里。

彩凤，他是白港半个世纪以来最有权势的人。解放前原是剃头的，学过打。他是雇农，农村的无产阶级。土改时当了干部，接着当乡长、公社书记，后来又上调县里当局长，退休后享受副县级待遇。他的墓碑上密密麻麻的记载着各种头衔和荣耀。

他在任时，白港的大事小情都会问过他，我们家的命运无疑在他的手掌之中。只是他在幕后，我们无从知晓。他是个含而不露的人。

他多年的高血压，好象死于肾功能衰竭。

在我的印象里，他总是保持昂首挺胸的姿态，威严而矜持。我们很怕他。地主富农摘帽后，他特意请我和伯陶去他家吃新年酒，我们自然回请他。这样两个家庭在一起喝酒，真是世道变了。曾几何时，他是统治者，我们是被压迫者。大概他希望我们能捐弃前嫌，不念旧恶。颇有化干戈为玉帛的意思。

他是识时务者。

在公社时期，他的家和我们是一个小队，他老婆叫边凤英，但大家都尊称她为“乡长婆”，她听得顺耳，应得自然。一队的人都让她三分，比如分东西，由她先挑起，好处也是让她先得。她安之若素，大家也觉得没有什么不正常。不过那时的特权有限，仅此而已。不象现在达到极致。

他并不是很坏的人，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他处的位置所决定的。

他的子女除老二顶替有正式工作外，其他都在农村。第三代就不清楚了。

明凤，彩凤的老二。仗着是贫下中农，又是彩凤的弟弟，是个霸道奸巧，总要占点便宜的一个人。我们家吃他们兄弟的亏不少。但他们做事不是那么露骨，不露痕迹。我调到峡江

中医院的时候，他得了一种怪病，说话含糊不清，找我看病，我真正做到了不计前嫌，不念旧恶，全力以赴。但我不知道他得的什么病，无能为力。后来越治越严重，不久就死了。可能是大脑里的什么病。他的妻子是村里的妇女主任，年轻时颇风流，能说会道，也是村里吃得开的人，晚年得了慢支，瘦得不象一个人，挺可怜的。

前妻的儿子叫王道孔，参过军，退伍后分在县农业局，一次在吉安开会，猝死在饭店里。和他睡在一室的永丰人，晨起和他告别，一拉他的腿，棒硬，才发现他死了，睡前还一起打扑克呢。他是个很活络的人，如果不死，或许可以捞个一官半职。

老二叫茂仔，和我年龄相仿佛，是儿时的好朋友。但各人阶级地位不同，不是很知心。他会开汽车，在当时是吃得开的人，他来过桃溪和新干县医院找过我，留他吃饭不肯吃。我们那里的人都比较演文，就是太讲客气，不随便吃别人的饭。

发善，比我们长一辈，我们叫他发善叔仔。当过会计，健谈。我们也听说过他嫖野老婆的故事。她老婆还善良，比较同情我们，这主要从言语上表现出来。八十年代她得肝癌死了，大约50多岁。不久发善也死了，是猝死，不知何病。

财善，他讨过几个老婆，都离了，财善不蠢，性格也不古怪，离婚不知何故。1961年，泳芝从湖南跑到江西来找老公，开始白港人是把泳芝介绍给他。泳芝一看财善三十多岁，还是痢痢头，眼泪马上就流出来了。大家知道不能勉强，又把泳芝介绍给又陶。又陶红着脸走来，泳芝没有说什么，当场就点头同意了。那年又陶21岁，比泳芝小一岁。

财善打了一辈子的单身，浑浑噩噩的过日子。财善的母亲我们叫家祺婆婆，家祺死于何年，不清楚。家祺婆婆，一位世故老人，对我们家还是蛮同情的。她和一个裁缝师傅同居多年。这个裁缝师傅叫老陈仔，长期住在他们家里。平日，老陈仔和家祺婆婆的小女儿共住一铺。住到十几岁。有笑话说，睡到半夜，小女儿伸手去摸老陈仔的裤裆，并说：“老陈仔，老陈仔，我来摸摸你的彼仔几大哩呀。”据说是她女儿说给别人听的。

老陈仔文革后才回到新余老家。

兼善，住在村子前头，他没有儿子，带了来兵的老二宗仔做崽。兼善患眼病在南昌开了刀，平时总是戴副眼睛走来走去，好象一个知识分子。

宗仔是我的小学同学，在校时合得来。小学毕业后就一直务农。他娶的老婆是胡谦老师的女，有一双美丽的眼睛。十年前，他当了村

里的二把手。村里正酝酿修村谱，清明时节，我回家扫墓，我和伯陶都愿意参与此事，把村里一把手、春华的儿子和二把手宗仔叫到梅陶，准备议一议几个具体问题。春华的儿子唯唯喏喏，而宗仔抵触很大，我们说一句他顶一句。后来我想，我们凭什么把村里的领导召到家里来，宗仔不服有他的道理。

发明，此人我未见过。因为有个发明姆姆，才知道有发明此人。发明姆姆和兼善住在一起。很和善和慈祥。在土改那种严酷的形势下，她对我们抱有难得的同情，所以我一直记得。

他的儿子，不知是养子还是亲生，叫发根，学名叫王乾初，会读书，考取了吉安白鹭州中学。高中毕业后教民办小学，教了多年，回家作田。现在村里每有丧事，多由他主持祭奠，念祭文，这也是农村不可或缺的人才。

他高中毕业比我早几年，如果他自己活一点，或是有靠山，找工作很容易。

来兵，公社时期当过很多年的大队长。当时的大队包括白港和中元、河堆三个自然村，约六七百人。一个没有头脑和能力的人。和富达老婆长期通奸。到七八十岁了还用糖果诱奸幼女，只是没有谁去告发，否则要蹲班房的。来兵活到八十多岁。他的妻子是个大暴牙，60多岁的时候死于胃癌。

寿兵，来兵的亲弟。和进财是一路货色。脑子不灵活，但有几分奸巧。就是不轻易上别人的当，甚至还占点小便宜。寿兵瘦小，样子不难看，他爱说话，见人就搭腔。他说的话都有道理，不过是鹦鹉学舌，拾人牙慧，跟他所说的事对不上号。常常让人觉得有趣。

他老婆偷了自来，他只是挂名丈夫。儿女其实都是自来的。妻子后来虽然和自来结了婚，对他的生活还是会关照。她不恨他，只是不爱他。这个女人称得上贤惠。白港有几对这样的夫妻。

扬明，矮子，吊眉子，喜欢出汗，一吃饭就满头大汗，都说这种人命苦。他确实命苦，因为没有儿子呀。扬明和我们一个生产队，比较自私。他的老婆元是友田的发妻。跟扬明没有生养，大概是扬明有病，因为他跟前妻也没有生养。

扬明从老屋场带个儿子，叫四仔，和我是小学同学，很要好。四仔脑子不灵活，有些笨，读书不进。后来当了很多年的赤足医生。他得了神经纤维瘤，中年以后满身疙瘩，令人恶心。所以都不愿接近，后来也就无人请他看病了。

四仔的老婆是童养媳，人高马大，四仔比她矮一个头。村里人常讲他的笑话。说四仔趴在老婆身上，老婆轻轻一翘肚子，把四仔簸下

床去。四仔从地上爬起来，不敢发作，只好自我解嘲的说，索性撒泡尿去。

四仔有个儿子从小就在外打流，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不做好事。当地把这种人叫骡子。

能卿，白港两户地主之一。他也划地主，真是造孽。他又矮又瘦，近于侏儒，而且有点獐头鼠目的丑陋。他不过是祖上留下一栋房子和若干土地，在数量上达到地主的标准而已。这样一个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忠厚老实人，不过是靠出租几亩土地过着小康日子。

阶级成分的划分，完全依据土地财产的多寡，不问来源及人的善恶如何，一旦划为地主富农，便被当做阶级敌人，经受无休无止的斗争改造，直到文革结束摘帽。三十年来受尽人间辛酸屈辱。

叔叔曾经对我讲过他们的发家史。

能卿祖上曾有人在金溪县的衙门里当狱吏。当地一个有钱的寡妇与人私通，生了一个孩子。她的本家去衙门里告发这件伤风败俗的事。能卿的先祖得了寡妇的贿赂，帮着寡妇把这件事遮掩过去了，寡妇得以顾全了脸面。后来，先祖用受贿得来的钱财回家买田买地，从此就发家了。所以有人说，他们得的是冤枉钱，生出能卿这样的后代实在是报应。

但能卿是个好人。虽然有些委琐迂腐，但他

善良，乐于用自己微薄之力周济别人。1968年我在南昌胃穿孔开刀，父亲问祥言借钱而遭拒绝，他知道后，赶快偷偷地把10元钱送到父亲那里，解了父亲燃眉之急。现在不能理解，为什么要偷偷的借给我们呢？后人不知道，文革时期，地富的钱常常有被无端没收的危险。能卿对我小时侯是个很有影响的人。我对三国演义的了解和兴趣，就是靠他的熏陶。

1954年的冬天，他夜夜打着火把到我们家里来，给我们一家人讲三国演义，为我们这个惨遭变故的家庭驱走悲伤。他读过几年私塾，有文化，三国演义的许多人物对话他都能背出来。所以他能引用人物的原话来叙述故事，十分生动。你看他手舞足蹈，绘声绘色，完全沉浸在故事中而忘乎所以。这时候我们一点也不觉得他长得丑陋，反而赢得我们的爱戴。

那段时期，他白天看书，晚上说书，他不仅给我们带来快乐，他自己也很快乐。

他活到七十多岁。那天，他正端着碗，一边吃饭一边和来访的南昌下放人张文斌聊天。聊着聊着就突然就不言语了，老张走近一看，竟死了。死前一点痛苦也没有，都说他前世修得好。

他的妻子，高个，身段好，端庄标致，如果她际遇好，会是一个出众的人。她嫁给能卿这样的人真是不幸。她有点小偷小摸的行为，如偷摘别人地里的辣椒茄子之类。这一点常遭

人恼恨。但她不是一个坏人。

晚年常生病，孤苦伶仃，十分可怜。最后，她患脚痛，一膝盖下有一块巨大的溃疡，我怀疑是肿瘤。到了这个地步，她还有强烈的求生的欲望，希望我给她治好。我给他两块钱，她高低不要。说：“我怎么能要你老弟的钱。”

她活到八十多岁。

他们没有生养，带了新溪村某的儿子生根做崽，和他们在一起生活了五六年，解放后回到父母身边。生根和我一起读过书，还算要好。能卿死后，墓碑上刻有生根的名字。文革中生根因曾经在地主家呆过而被人当做地主崽子受到侮辱，气得把能卿的墓也挖掉了。

道才，有点文化，一个喜欢说风凉话的人，颇有见地和幽默感。他的长相是个说相声的材料，也适宜演小丑的角色。他患有慢性眼睫炎，睫毛很少，眼周总是一圈红，看起来越显得滑稽。他会耍点小聪明，占点小便宜。因为阶级好，或者说成分好，敢说怪话，引人发笑。他喜欢讲红军的故事，说红军到村里来搞妇女，老少都要。一个老婆子说：“哎呀，要不得呀，我老了，牙齿都没有了！”红军回答说：“要得，要得，冒有牙齿不要紧，我又冒啥个把得你吃！”

道财节俭出了名。每餐的菜碗他都要“扁”过。扁，就是把饭倒进空菜碗里去拌一顿，把

菜碗里的菜汤油水全部蘸干净，荤菜碗要蘸二遍。有时让小孩扁第一遍，自己扁第二遍。

他活到七八十岁，妻子是得肝癌死的。

世爱是他的大儿子，结巴子，吉安一中毕业。其实他不会读书，不知他怎么侥幸就考到那里去了。毕业后教过一段时期的民办小学。若有能力，高中毕业应该找到一份好工作，但他作了一辈子的田，操了一辈子的牛屁股。

季陶是个喜欢学习的人，曾经希望通过自学来提高文化水平。他把中学的语文课本拿来学习，并记了一些笔记。文革时抄家，把他的笔记也抄去了。世爱为了显示他有水平，能看出问题，他从季陶的笔记里找到两处罪证。一是在一页上写着“党员登记表”，证明在记变天帐。其实《党员登记表》是高中语文课里的一篇课文，是蒙古作家马拉沁夫的小说。他正在自学这一课，写了个标题而下面没有内容而已。另一个问题是把“抓革命促生产”写成“摘革命促生产”。前者是毛泽东的话，是当时的一句口号，意思是通过抓文化大革命来促进生产，季陶写了一个别字，世爱分析说，季陶的恶毒用意是要“把革命摘掉，何其毒也。”他的高见，使季陶六月天站在烈日下晒太阳。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吹毛求疵罗织罪名的。

万福，早死了，未见其人。我只认识万福嫂。我在上学的时候要经过他们家的门口。一个

三十多的女人，缩着头髻，颇为丰满，嗓音很粗。这就是我最初的印象。她的儿子茶仔是季陶要好的同学，我们常在一起玩。一个很懂礼貌的孩子，大概是家教好的缘故。

有福，万福的老二。有点文化，很早就参加了工作，在商店里卖东西，后来当了合作社的主任。他总是歪着头，脸无表情，一副傲慢的样子。小时候颇敬畏他。退休后仍有工资，常坐在门口看报，令白港人羡慕死了。我们见面会互相打个招呼，摸不透他是什么想法。他有个儿子和洁正差不多的时候大学毕业，在广东某地当老师。

财根，他是新余人，从小被带到白港来做发明的儿子，不知怎么后来发明又有了发根做儿子。他有点耳聋。大家叫他财根聋牯。他娶的老婆是湖南人，和泳芝一起来的，后来生活得还算美满，有一个儿子读了大学。

愚民，勤快人，有点妇女的性格，说话小小声声，婆婆妈妈，少一点男子汉的阳刚之气。他儿孙满堂，都是调皮鬼。大儿子王平原是我小学同学，初二时到剧团去唱戏了。老婆高个子，瓜子脸，年轻时可能还漂亮。颇活跃一个人。

他们是个特殊的家庭。

有个叫王定仔的人，老屋塘人，那是一个离白

港十多里的深山沟里的小村子。定仔比愚民小几岁，解放前就住在愚民家，和他们生活在一起。长工不是长工，朋友不是朋友。实际上是老婆的姘夫。一群儿女，多象娘。不知道哪些是愚民的哪些是定仔的；或者都是定仔的。两个男人共一个女人，相安无事，和平共处，几十年如一日，儿女们听之任之，村里人也见怪不怪，真有些不可思议。

定仔在土改时划为雇农，在白港分了土地，表明白港人承认了他的合法地位。

定仔当了多年的治保主任，专管地主富农。他斗地主最狠，丑得肉痛。丑，在土话里是凶恶的意思。他在白港几十年，老了，得了严重的气管炎，不能动了，凄凄惶惶的孤身一人回到那个小山村老屋塘。

友田，他的后妻原是进财的老婆，她生了许多子女，却没有一个是进财的。不是包办婚姻，进财这样的人是讨不到老婆的。友田的原配后来嫁给了扬名。扬名原来的原配哪里去了，不清楚。友田和原配生有一个女儿，叫秀仔。秀仔说亲的时候我站在门口看，城上村某青年由媒人带到友田家，和秀仔同坐一条凳上，友田指着那位青年，问女儿：“你嫁给他同意不同意？”秀仔含羞地看着地下，点了点头，终身大事就这么定了。

进财的老婆或是友田的老婆，高高的，面目

清秀，有些苗条，待人温和善，和我们小孩子说话的时候非常亲切慈祥。四十多岁的时候得子宫癌死了。早些年，我曾经在梦里和她寒暄，突然意识到她死了。这不是鬼吗？我立即拿石头砸过去，并大喊一声，把睡梦中的罗米吓了一跳。

她死了以后，友田便一直打单身。他是一个好嫖的人。他相貌出众，儿女都象他。

大儿子王世民和我小学同学，后来参过军，退伍后参加了工作，担任过乡武装部长、乡副书记。除了彩凤，白港就是他当的官最大了。一个很本分的人，魄力不大。

立田，和友田是亲兄弟，我忘了谁是老大。一个沉默寡言的人，老婆没有生养。夫妻俩在大跃进时期先后去世的。都在中年。这个家庭就这样消失了。

乐隆，进财、花财的父亲。都说他是在大跃进时期饿死的。那时他年纪大，病了不能劳动，成天躺在床上无人过问，自然无人端饭给他吃。大家都在挨饿。饿死一个不能劳动的老头子并不稀奇。

进财，他个子不小，头小，不是一般的小，而是畸型的小，蠢得很，比寿兵更蠢。全村人都喊他进财蠢子。他是白港的活宝。虽然蠢，初次和他接触的人，会认为他很有口才。因为他

见了人，喜欢自言自语，说个不停，全是别人常说的，不过是鹦鹉学舌，拾人牙慧，无的放矢。

他的一群儿女都是有田的。他不过是名义上的丈夫和父亲。别人逗他：“昨天你跟老婆睡了吗？”“没有，肚脐眼都没有份！”老婆虽然没有份，但名义上的妻子在生活方面照顾得不错，儿女也认了他这个父亲，把了点良心，死了同样为他披麻戴孝。

他的命运和寿兵差不多。

花财，进财的老二。他的头很大，也不怎么聪明。我读小学二年级的时候，他读五年级，摹了毛主席的头像卖钱，有点象，二百钱一张，我买过他两张。他五十多岁的时候中了风，在床上躺了几年。那时我尚在桃溪，他妻子花英写信给我，要来桃溪医治，我不敢答应。花英长相不错，也蛮聪明能干。

他们的女儿在广东打工，找的对象是浙江人，到浙江安家落户去了。

哭珠，圣芝的老弟，大名叫道明。从小过继给芝腾。但芝腾有亲儿子财云，后来将错就错，名分上还是芝腾的儿子，反正他们两口子分开过。哭珠小时候调皮，心术不正，鬼点子多，对地主富农想尽花招来作弄。后来当过兵，学得斯文起来，见了我一口普通话，本乡本土的，这样说让我颇感滑稽。

他的妻子是童养媳，叫贱仔，大了叫贱英。长得好漂亮，我和茂仔曾约她一同去山里放牛，企图玩弄她，她不肯去。这是我唯一一次起这样的邪念。某年清明，回乡扫墓，我在路上迎面遇见她，一头白发，我突然想起儿时的荒唐事，不禁有些感慨，说：“你也老了。”

李财元，吉水人，不知他怎么来的白港。他从小在我们家做看牛崽。小名叫猫仔，因为他瘦得象一只猫。说他是我们家养大的也未尝不可。我们家对这样一个小孩子决不会虐待的。土改后分了田，在白港落了户，是少有的几户外姓之一。他娶的老婆是自来的女。他是雇农，所谓革命的中坚力量。

六八年春，我在一个角落里看他在众厅下主持斗争四类份子的会议。会场上烧着劈柴，乌烟瘴气，他跳手舞脚，声嘶力竭。大概他的感觉非常过瘾。解放快二十年了，还在说什么“你们吃惯了剥削，想变天，想蒋介石打回来，是痴心妄想”“不老实改造就死路一条”之类的老话，谩骂到底。他没有文化，没受过教育，除此他不会说别的什么。其实他人不怎么坏，好比一出戏，需要他要扮演这样一个角色而已。老话说惯了，听的人也听惯了。

他一辈子就管管治安，在地富面前才显得他翻了身。事实呢，他子女多，到老都是在贫困

线上挣扎。他后来得了胆石症，开了刀，骨瘦如柴，请我去开方。他恭恭敬敬的和我打招呼，我突然想起他几十年来的表演，真的感慨人生如戏。

陈怡生，湖南人，原是国民党的逃兵，流落在白港，后来在我们家做了多年长工。祖父很赏识他。长工喝的酒都由他保管。

解放后，划为雇农，在白港分了土地，从此在白港安家落户，生儿育女，儿孙满堂。

怡生是个老实本分人，土改时农会认为他立场不稳，斗地主不力，说他是地主的狗腿子，命他胸前挂着狗腿游街。他在我们家多年，感情颇深，把我们家当自己人。

他的老婆是生云离掉的，生云嫌她没有生育，可人家后来有四五个小孩。1965年夏，她从楼梯半中腰摔下来，当时疼痛不甚，不在意，照常劳作。几天后，她从山上挑一担柴回来，倒在路上。恰好县医院队下乡来了，诊断为脾破裂，但由于没输血条件，看着她死去。

厚生，好象也是外姓人，我不知道他的来历。他一个单身汉，住在万福的隔壁，万福死了，他常从楼上爬到寡妇房里通奸，被捉奸人用劈柴打个半死。故事我都听说过好几遍了。但后来还是结为夫妻，生儿育女，白头到老。

王老槐，祝安的父亲，有点文化，一向住在县城，老了才回到故土。从不打赤脚，更不要说

下田劳动，言行举止都不象农民。和后婆子生活在一起，与子女和村人不太来往。我们小孩子觉得他们有些怪。其实，城里人就是这样，只是我们不熟悉城市罢了。

上面提到的父老乡亲，许多人已经作古了，恩怨已随风飘散。而他们的子孙，今天照样面朝黄土背朝天，跳出农门的很少。听说现在每年都有许多人外出打工，成了所谓的农民工。几十年来，那些曾经翻身做主的贫下中农们，并没有得到多少实惠啊。

白港人世代为农，见识有限，大部分人是淳朴善良的。他们的音容笑貌仍鲜活的存在于我的记忆中。但人性总是有善恶两面。只有政治清明，百姓才能隐恶扬善，安居乐业，和谐相处。解放后的前三十年中，阶级斗争这根弦总是绷得紧紧的，统治者对政权没有信心，害怕报复害怕复辟，在他们眼里，到处都是敌人，没有安全感，因此不断地搞运动，挑动人斗人，借以巩固政权。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人性中的丑恶得到鼓励、张扬，为非作歹被贴上革命的标签。

小小的白港村，不能例外。我们几家四类分子被当做敌人，总是处于被管制被挨斗被歧视的境地，没完没了，无休无止。其实，我们虽然被剥夺被压迫，我们只求过自在日子，并无变天的幻想。

在这样的家庭中成长起来，就不难理解我为什么会那样胆小懦弱了。

南汾村

从白港往东，穿过一片田港，再翻几座小山，约三四里，就进入一个山坑，山坑深处有个小村子。这就是母亲的生身之地——南汾村。这是我生命的另一源头。

南汾是个穷地方。周围的山是都矮山，属丘陵地带，到处裸露着红土，只有一些永远长不大的小松树和灌木丛。这样的地方我们叫它痢痢垅；田也是薄田。尽管是穷乡僻壤，居然也出得起地主，地主就是大舅一家。

解放初，南汾不过七八户人家，分杨、朱两姓。朱姓原是大舅的佃户，土改后一直是大队干部，压了杨姓几十年。

粉碎四人帮后，杨家都摘了帽，又人多势众，朱家便知趣地迁回老家。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朱有个儿子叫朱二保，和季陶同班，以优异的成绩从峡江考入南昌二中，因文革，未及毕业就回家作田。幸运的是后来被推荐读了清华大学。他一到校就去信和女朋友分手，当时引起公愤，说他是陈世美，要把他告回来。但乡

下人不知道，时代不同了，是陈世美又怎么样呢？

外公外婆我都没有见过，父母很少提起他们，对他们的情况我几乎一无所知。我们三个舅舅。

大舅一家在土改时划为地主，他们的家境如何我不清楚，只知道大舅在城里开了店，家里的土地租给人家种。大舅和大舅母都是在土改中死的，也不知他们是什么样子。听说刚开始土改了，大舅就烂脚烂死了，人说他的死与土改前的恐惧有关，换句话说说是吓死的。

大舅有三个儿子。老大老二都是作田出身，没有多少文化，土改时已是成人，故都划为地主份子。份子就是敌人，专政对象。子女虽说是属人民范畴，但实际上深受歧视。

大老表叫明善，比较世故。二老表叫德善，头脑就简单多了，嗓门大，嘴巴没有遮拦，为此吃了许多苦。二位老表都活到八十岁，大老表死于脑溢血，二老表死于胃癌。三老表叫杨远图，土改时才十七岁，他算地主子女，在吉安读简师（相当于后来的小中专），地方上扬言要提回来斗争，他闻风而逃，跑到新干当了一名小学教师。解放初期，有点文化而又脑子灵活的地富子弟，一看形势不妙，纷纷逃离家乡，远走高飞，不少人在外面找到了工作，有的还混得不错。三老表在新干教了几十年体育，快退休时，通过关系调到新余，各方面都比在新

干时强多了。因而非常得意，见人就夸耀一番。三老表只比我大八九岁，身材修长健美，性格外向，很健谈。每年都会来我家走一走，但我们的性格迥然不同，我不喜欢他见人就是一大堆废话。我从没有去过他家。很多年前，他托我在桃溪替他岳母买一副棺木料，这个忙本来是应该帮的，也是很容易帮到的，可是始终没有办到。他不知道我这个人不善外交，自己很少求人买什么，但他怨我不肯帮忙是自然的，我现在想起来仍感歉疚。

大舅还有几个女儿，我与他们从无来往。

关于三个老表，有些记忆还是很清晰的。

大老表患有高血压，我在桃溪的时候，曾来看病，那时交通不方便，要转几次车，还要乘船。他告诉我，好象有鬼似的，睡到半夜，就象有什么东西压在身上，直透不过气，非爬起床走几步不可。我认为这是中医的奔豚气，但吃过几付药也不灵。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心衰的表现。几年之后，他又为此病来峡江中医院来找过我。尽管他有多年的高血压和心脏病，仍活到八十多岁。

二老表是高中同学陈小庐的丈人。大约十年前，陈小庐来信说，他的丈人检查有胃癌，来新干检查一下行不行，我回信告诉他，既然已经诊断清楚，来新干就没有必要。后来就去新余看了，也是这个结果。不久，我回家扫墓，不知道他怎么知道我回去了，拄着根拐杖，颤

巍巍地从南汾赶来，我们正在季陶家吃饭，大家急忙把他让在上席。他把检查结果给我看了，病情已很严重，但精神还好，仍是大嗓门，两眼盯着我，问：“真的就没治了？”他动过几下筷子就起身要走，大家知道他得的这个病，都不愿同桌共餐，所以没有真心挽留他。我把他送到村口，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想到他转瞬之间就要离开人世，为他感到悲哀。

第一次见三老表，是五十年代的某年春节，他带了表嫂回家过年，我们一起在三舅家吃饭。他们都长得漂亮，正是风华正茂的时候，一言一行都很吸引我，令我崇拜。十五六年后，我们在新干饭店邂逅，知其在力江中学教体育，从此，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多了。

三个老表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喜欢说话。好发问好议论，也不看场合。他们都没有多少文化，尤其是大老表二老表，见识又不多，谈吐难免俗气。我不喜欢这样。

二舅和他的独子都死得早，我没有见过。二舅母个子矮小，老了也还有两个酒窝，一副好笑脸。可知她年轻时娇小玲珑，讨人喜欢。解放后游（就是同居的意思）了一嫁，和县城的一个叫“沙官”的单身汉生活了许多年。沙官死后又回到南汾，活到九十五六岁。晚年卧病在床，由两个八十岁的老表姐轮流服侍。表嫂早寡，招了个新余姑丈上门，将老表的一子一女抚养成人。二舅之孙杨文庆，江西大学中文系

毕业，任新余一中校长多年，是一市的知名人士。他比我大几岁，但他打了点慌，退休却不比我早。

三舅过继给三爱婆。三爱婆七十多岁了，很矮小，我们跪着给她拜年时，她牵我们起身的时候几乎不用弯腰。三舅土改时划为中农，他是个朴实木讷的农民，我很少听他说过什么话。三舅母很慈祥，待我们很好，所以去他家的次数比较多。他们只有一个儿子，也老实得有点木，娶个老婆却很活。三舅有几个女儿，都快到结婚年龄，我觉得她们很漂亮。母亲对三舅感情很深，“我三哥我三哥”的叫得很亲热。三舅比母亲多活了几年。

母亲有个姐姐，也就是我们的姨娘，嫁赫里，土改时划为富农，他们没有儿女，于文革前双双去世。母亲好象和他们不很亲热，很少往来。我怀疑不是同胞姊妹。我去过他们家一二次，印象已很模糊了。

在我的记忆里，母亲从未回过娘家。解放后，她几乎没有离开过白港。

1957年以前，大约有二三年的时间，我和季陶每年都会去南汾拜年，在三舅家住一晚。受母亲的嘱咐，各家都去走走，他们或者留饭，或者请茶，以点心招待。所谓点心，一般是番薯片、炒黄豆、糖片等农产品，花生是最高级的，普通人家少有。我们觉得，这些亲戚们相处得很和睦，对我们非常亲热。

其实，我们涉世不深，只看到表面现象。

南汾七八户人家，竹木环绕，鸡犬相闻，颇有诗意，是我们少年时代向往的地方。除了拜年，我和季陶常去那边的山上扒松毛（就是松树叶子，针一样细，好烧），借机跑到南汾去吃午饭。但有几次，我们看见三老表在抄田，他只问了一声“你们扒柴呀？”，而始终没有说“到我们家吃饭去吧”，让我们很失望，只好快快回家。

有一次，我和季陶在三舅家吃饭，我只管往荤菜碗里伸筷子，三爱婆看在眼里，就对季陶说：“你这个老弟怎么不吃，看你哥哥，独会吃。”我一听，知道三爱婆在旁敲侧击，脸刷地一下红了。

我曾把这个故事讲给亚正他们听。亚正说，你太敏感了，人家可不是那个意思。亚正怎能知道，半个世纪前，口粮短缺，荤食很少，请一次客不容易，弄点荤食主人很少动筷，哪能容你横切直切？

已经四十年没有去过南汾了，我不知道那里的种种变化。几年前，听三老表说，虽然是一公子孙，人也不多，但心总是齐不了。比如说，他答应牵头，并个人出资五千元，共建一个祠堂性质的房子，以便老了人有个祭奠的场所。谈了几次都不成功。

俗话说，一代亲，二代表，三代你不知我不晓，我的孩子们确实不知道有那么一个地方了。

祖父

先得从祖父的祖父说起。

祖父的祖父，王氏三十八世孙，叫上腾

(1833₁₉₂₀)，村谱载，他毕生口不服药，手不持仗，活到九十岁（按当地的）是我们祖父的父亲，也就是我们的曾祖父。老三培本是秋苟的曾祖父。

曾祖父培槐是秀才，在一府中名列前茅，名噪一时。他讷言寡笑，为人质朴，与人交往，宁肯亏己也不负人。荒年时乐于周济他人。书生气重，迂腐，邈邈，常被村人取笑。曾母亲

(1861₁₉₃₀) 则人高马大，生性泼辣，待丈夫很刻薄。（在父亲的遗物中，字体仁，号石泉。父亲告诉我，祖父只读了两三年书，但写算都来得，精明能干，是个多面手，又善于理财。他买田买山，开药店米店，在他手上，家业兴旺起来。最多时，家里顾了七八个长工，佣人也有几个。是远近屈指可数的富户。听说祖父曾有一个雄心勃勃的发家计划。如，在县城建几栋房子，开店经商；培养二哥当家理财，其余的孙子都要读出去，要出几个留学生。这一切，随着解放而破灭。

不过，话要说回来。即使不解放，祖父的宏图大略也未必能够实现。因为他好赌，手气又差，又不服输。我曾听人说，如果迟三年解放，体仁麻子可能要把整个家业都输光。

当年土改，划阶级是以解放前三年的经济状况

为依据的。真是把个家业败光了，一家人就不会受那三十年的罪了。

祖父热心于公益事业，如倡导和主持修庙、修祠堂，建学堂、修桥铺路等，为村里做了许多好事，在地方上颇有声望。所以，邻里纷争，经他调解，常心悦诚服。

他算是地方上的一位绅士。他为人并不奸诈狠毒，我不知道他曾经有过什么劣迹没有，但他决不是横行霸道的土豪劣绅。

在我最初的记忆里，村里人对祖父的称呼是带着敬意的“体仁老爷”；后来，虽然仍叫“体仁老爷”，听起来却觉得变了味；不久，就变成含有轻蔑的“体仁麻子”了。至于“老爷”的称谓是怎么来的，不得而知。好像是用钱捐来的。

祖父晚年清瘦，但很健康。其实他不是麻子，只是皮肤黝黑，脸上有许多褐色斑点罢了。

土改时，我们家被扫地出门，紧接着父亲、叔父又去东北劳改。一连串的变故，没有把六十开外的祖父击倒。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也并不太沮丧。

祖父读书少，一点也不迂腐。他处事麻辣果断，我从没有看见他举棋不定的时候。因果断而马虎也出了名。他耘起禾来比谁都快，等水清之后，草都没有耘死，大家指责他，便气得噘起嘴，黑着脸，半天不说话，他一生气就是这个样子，让我们有些害怕。

祖父还有个毛病，就是邋遢。我的岳母解放前曾和他经常见面，留给她的印象没有别的，也就是邋遢。他喜欢趿着鞋走路，鞋跟总是趿得油光光。吃饭的时候，他筷子上满是饭菜，又偏偏喜欢在菜碗里抄来抄去，我们小孩子看得恶心，互相做面做嘴，一旦让他发现，头上准会吃栗壳子。

但祖父是很疼爱我们的，喜欢把我和四弟带在身边。我们常和他一起上山砍柴，累了的时候，他常说：“唱支歌吧。”大概孙子的歌声能带给他希望吧。

土改后，家里有祖父、祖母、母亲、婶婶以及我们姐弟，共十口人。这一大群人，吃饭都是个大问题。那时，姐姐出去工作，大哥、我、四弟相继去读书，家里分得的几十亩土地，就靠祖父和年仅十四五岁的二哥两个劳动力了。是祖父带领一家人走出了困境。

五六年冬，父亲劳改释放，二哥通过几年的磨练，成了强劳力，祖父肩上的担子才轻了许多。那时，政治气候比较宽松，家庭又逐渐恢复了生机。好了伤疤忘了痛，祖父又想入非非起来，甚至还望生个孙子。

祖父一生爱面子，喜欢奉承，谁要在他面前夸他有五个孙子，他立刻会显得非常得意。

他读书少，一点也不迂腐。

可惜好景不长。

五七年冬，接近年底，祖母去世。才十多天，

他独自一人上山砍柴。其实是借砍柴为名，去祖母坟上看看，有人看见他在坟上痛哭。谁料到，就在回家的路上发了病。砍好的一担柴挑不动，后来由二哥挑了回来。

记得那天下午，天色阴暗，北风呼啸，是雪前常有的奇寒。我在家对河的菜地里耒菜。一只死吉鸟在我身边窜来窜去，给我一种不祥的预感。这种鸟常常凄厉地尖叫，令人不寒而栗。大人们都说它会带来凶信，所以叫它死吉鸟，人人都怕见到它，尤其怕听到它的叫声。不是我渲染迷信，那天的情景确是如此。

“开门，开门！”对河突然传来急促的喊声。我猛抬头，看见戴着毡帽（父亲从东北带回来的）的祖父，迫不及待地拍打着自家的大门。一家人正关了门围着火炉烤火。大家慌忙迎进祖父，母亲把火烧的旺旺的，祖父还是冷得不住地发抖。

大约是第二天或第三天，祖父就病得不行了。他恍恍惚惚，一会儿循着床沿摸来摸去，似乎找什么；一会儿坐下来，把火盆、凳子等东西拖过去当鞋穿。后来我才知道，这就是中医说的“摸衣循床”，是极其凶险的症候，在我多年的从医生涯中还未曾见过第二例。二哥冒着大雪请来中医张公甫，公甫先（“先”是我们当年对医生的称呼）一进门，看见祖父兀自乱动，问了几句，没有应答，就勉强把一支温度计放进祖父的嘴里，只听“喀嚓”一声，温

度计就被咬断了。父亲惊呼：“水银有毒，水银有毒！”大家便七手八脚，慌忙把祖父嘴里的水银和半截温度计抠了出来。公甫先看着祖父这个样子，束手无策，默默的站了一会，说了几句表示没有办法的话，背着药箱走了。就在这一天，祖父去世，享年六十七岁。守在身边替他送终的有：老大夫妇、二媳妇、三个孙子。

祖父的病是急性感染，很可能是肺炎。病因很清楚：送走祖母才半月，祖父仍沉浸在悲痛之中，一受寒，悲寒交迫，怎不会病倒呢？但若是现在，该不是难治的病。当时，离家一二里的城上村有一个小诊所，只有三五个医务人员。张公甫，张湍清等都是半路出家，看了几本医术就开方子的医生，而青霉素之类的抗生素，当时还是稀罕物。病初的前两天，仅自家用了些土办法，后来请来公甫先，又没有做什么处理，所以祖父基本上没有得到治疗。

祖父最大的遗憾当是没有和叔父见上一面。就在死前几天，叔父从东北寄信来，告之马上要被释放回家的消息。祖父很兴奋，天天叨念着，扳着指头算日子。谁知苦等了五年，竟不能坚持最后的二十天。

祖父死后，大家想起了他去世前的一些颇为些蹊跷的言行。

料理完祖母的丧事，祖父去了一趟县城，会了几位多年不见的朋友，女儿、孙女家都去

过。自从土改以后，祖父不愿见人，很少走动，而这一回，该去的地方都去了，他是去辞路吗？后来亲朋们回忆起来，都说“是呀，是呀！”。比如，老友生文说，他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是特意来见见面。”他买回一筒碗，准备过年用，回来数数，只有九只，母亲问他为什么少买一只，他回答说，不要这么多，是我拿减的。还指着买回的年货对母亲说，这些东西给你们过年，我已经过了年了（他的本意大概指在街上吃得好，象过了年一样）。

没想到，一语成谶，莫非祖父有了预感？

祖父突然暴病身亡，让大人们一时慌了手脚，因为没有棺材呀。按乡俗，无论男女，中年以后都早早准备了棺材的。但土改时祖父的棺材分给了烈属赌客（他的真名已经忘了，因为大家都是这样称呼他，没有人叫他的本名）好在赌客并不稀罕睡别人的棺材，他主动提出“去抬吧”。后来请中间人作了价，由我们买回来。

祖父的遗体用一张床单包裹着，放在一块床板上抬到村里祠堂去入殓，走到半路突然滚在地上，在场的人都感到奇怪和惊恐，怎么会这样？都说他没等到老二回来，不甘心呀。

他生前算过八字，说他只有一个儿子送终，真的应验了。

两位老人在半月之内相继去世。后来有人说，祖父拆了庙里的殿堂，冒犯了神灵，所以遭此

报应。

祖母

祖母姓刘（1888.11~1928.4），生有二男一女，即父亲、叔父、姑母。她死于肺结核。

小时候常听大人们讲“十八只火笼钵”的故事。说的是某年冬天，有一次看戏，祖母坐在前排，观众都想一睹祖母的风采，争着向前排挤，一时引起骚乱，竟踩烂了十八只火笼钵。因为那天冷，看戏的人都提着火笼取暖。

这是极言祖母的漂亮。或许只是一个故事而已。

写到祖母的死，我突然想起来，肺结核对我们这个家的危害实在大。祖母40岁就死了，不知她是被谁传染的。但她的多个后人染有肺结核，可能与她有关。

父亲是结核。解放前，结核病没有特效药，得了病只能靠疗养，死亡率很高。父亲在青年时就患有结核，为此离职在家疗养数年。一辈子就是个痲病壳子。父亲无烟酒嗜好，却死于肺癌。我估计是钙化灶癌变。医学上有此一说。叔父的前妻死于肺结核。

大哥是肺结核。他因此没有资格考大学。

我也是肺结核。我的结核不知起于何时，前

几年体检时发现钙化灶。才知道患过肺结核。我的结核是自己好的。我的痨病壳子体型也许与结核有关。我也许是从大哥那里传染来的。我的病没有及时发现，说不定是好事，否则在某一年要休学，一生的命运又是另一个样子。

祖母的弟弟，我们的舅公，叫刘鑫高，是个老实本分的农民，但他的一生饱受磨难而带有几分传奇。

红军时期，他参加革命，当过中共峡江县委书记。现在的县委书记不得了，但那个时候，一个县能有几个党员，县委书记不算个啥。

红军北上后，他回家种田了。土改时划为地主。虽说也是地主，但不算富裕，比起我们家，要差一大截。而土改时挨的斗却不少。有一次，白港人押他来斗，数九寒天，在一个几尺深的大酒桶里，放进几条活泥鳅，命他脱光衣服，跳进去捉。泥鳅滑溜，捉得住吗？

看起来老实巴交的农民，心灵深处竟如此齷齪狠毒，竟想出这样的恶作剧来折磨人。

文革中，又查出舅公是“叛徒”，受尽凌辱。其实他只是不想干“革命”，自动脱党，回家种田而已，并没有出卖谁。文革后落实政策，在摘掉地主帽子后，又说舅公当过县委书记，是老革命，于是又享受老革命待遇，政府每月给点补助。

从舅公一生的经历，可以看出，在那个历史时

期，老百姓是怎样被折腾来折腾去的。

舅公干瘦干瘦的，但身板挺直，显得很精干。舅公很慈祥。他非常拘礼，讲客气。他家住在廖里村，离我们白港七八里，常在我们家门口经过，不管我们怎样强拉硬推，却从来不肯进门吃餐饭。我们那一带的人多有这种性格，太过分了就是毛病。

舅公活到九十多岁。

舅婆对我们则很一般，我曾在他们家吃过饭，热情中有点虚伪。

刘振华是他们的儿子，我们叫表叔。他当过小学老师、校长和公社干部。小时候，刘振华吃住都在我们家，可以说是在我们家长大的。但解放后和我们却一点也不亲了。

土改初，农会规定，地主富农在路上碰见人，不管是谁，都要赶快让路，低头站在一旁，并报告自己到哪里去，去干什么。有一次，婶婶出去砍柴，远远看见来了一个人，就马上低头让在一旁，等那人走到身边，也不敢看看是谁，就如此这般的汇报了一遍，那人一声不吭地过去了。等他走远，婶婶抬头一看，竟是表弟刘振华，不由得心里骂了一句：“这个短命鬼！”其实也不能全怪他无情无义，他那时有工作了，恐怕也是怕别人发现，说他立场有问题，那可吃不消。

后祖母叫陈财妹（1892.12.24~1957.11.25），嫁给

祖父前的婚姻状况我不知道。她从未生育过。也许就是这个原因，祖母做人一贯低调。

父亲常提起祖母早年的一次壮举。

红军时代的1930年，家乡突然来了红军，全家躲反，从县城过赣江一路逃到一个叫庐前的小村子。这时，曾祖母突然去世，一时没有棺材。其时县城已被红军占领，传说杀了很多人。谣言四起，人心惶惶。一家几十口中，没有谁敢去县城买棺材。看着大家急得团团转，祖母挺身而出，冒着生命危险，只身渡过赣江，硬是从城里买回一口棺材，解了燃眉之急。一个女人有如此胆量和才干，令一家人感动不已。

解放前，家里在县城开了一家米店，一直由祖母在管理着，所以她住在县城，不轻易到白港去。

五一年岁末，我七岁半还差一点。旧历年将到，祖父要给住在县城的祖母送点年货去。不知出于什么考虑，也许是给祖母作个伴吧，祖父把我也带到县城去。从白港到县城抄小路是四十里，一路走去，祖父一直给我戴高帽，夸我脚劲饱。在他的鼓励下，走得似乎很轻松。走到叫马车下的地方，当时有个油榨房，再往前就进北门了。祖父说，你第一次进城，先要磕三个头，这是老规矩。同行的大哥也跟着附和，说他也磕过。看他们都很认真的表情，我信疑参半，磕不是，不磕又不是。终因

怕人讥笑，不肯磕，带着几分不安，爬了几十级的台阶，进到城里。

祖母住的房子原是一家米店，分上中下三进，厅堂很大，两边的厢房很小，显得空荡凄清。进门右角是一个小卖铺，店主是祖父一个叫美占的朋友；中进住着父子俩，儿子叫狗仔，年纪和我差不多，但体质很好，长大后身材魁梧，相貌堂堂，曾和小蒲关系暧昧，因此害得小蒲离了婚。这是后话。祖母住在里进，一个小厅和一间小房。小房小到只能放一张床和一只尿桶。姐姐在县城某单位工作，常来看望祖母。她对祖母的感情较深。因为当年祖父不让她去南昌读书时，是祖母站在她一边，帮了她的大忙。有几次，姐姐一来，就当着我的面坐在尿桶上小便，使我非常尴尬难受。

祖母大概六十上下，偏矮的个子，满脸皱纹。凭我的年纪，看不出她年轻时是否漂亮。土改时，她一直留在县城。她是后妻，没有生养过，大概是这个原因，她为人谨慎，涵养很好，人缘也很好，所以在土改中没有提回去斗她，因此她没有受什么苦。

祖母在县城种些菜，煎油斋斋卖，生活虽然清苦，也算过得去。

祖母很矮小，满脸皱折，终日默默不语，很少见她有笑容，才六十出头就显得分外苍老。那时她以卖“油斋斋”（油饼）维持生活。每天，她在街头支一个锅，在一个铁皮做的带把的圆

模子里，舀一点掺有葱或韭菜的面粉糊，放在油锅里煎，就煎出圆圆的香喷喷的油斋斋。生意好的时候一天可以卖出几十个。

那时的县城叫巴丘镇，顶多不过四五千人口，不如现在的一个小乡镇。

祖母住的这条街叫横街多。她住在街头，对面是县医院，红军时期，毛泽东曾在这里住过一夜，文革后辟为毛泽东故居。横街街宽不过丈余，铺着麻条石，两边都是板壁屋。横街商店很少，少数几家临街开着一个铺，卖些杂货。有一次，我和季陶去了县城。一天，我和他出去玩，经过一户人家门前，看见柜台上的一个小盘里放着几个苹果，周围又没人，我就踮起脚，伸手去拿，手刚挨着苹果，就听见有人喊“哪个，哪个？”吓得我们撒腿就跑，一口气跑到河边，魂都没有了。

从横街沿着不太陡的斜坡路走二三百米，就到了中山场，约二三亩大小，有一个小戏台，这就是县城的广场。再往前走，就是大街。对于横街而言，大街就是直街了。县城就这两条街。

大街临赣江。赣江流经这里，两岸高山对峙，江面最狭，峡江县因此得名。这里是最好筑坝的地方，我们从小就听说峡江要建大水库，直到前几年，国务院才批下来了，现在正在施工。

大街上游的一头叫南门，下游的一头叫东门。

南门到东门不足两里地。南门的居民多是渔民。那里有一茶馆，常有二三十个喝茶的，挺热闹。大街也没有什么大商店，都是些小铺子。出东门是一块空地，叫马坪多，曾经是放马的地方，除了草，还有些零星的乌桕树，解放初期被枪毙的人都在这里执行。所以有些吓人的传说，我们小孩子都不敢去那里。马坪过去便是峡江中学。

祖母逼着我也上街卖油斋斋。巴掌大的巴丘镇，卖斋斋的就好几起，条条街上有吆喝声：“卖油斋斋哟——”我天生爱面子，死也不好意思开口。我只是提着个小竹蓝，里头放着十多个油斋斋，哭丧着脸在大街上走来走去，这个样子谁会买我的呢？卖过几次之后祖母就不让我去了。

有一次，祖母要我去买米，走到中山场，看见地上有两张宣传画：一个威武的解放军握着一支枪，枪上了刺刀，下面是一行字“一定要解放台湾”。我宝贝似的捡了起来，折了几折，放进米袋，不知怎样就把买米的两百块钱（相当后来的两块钱）弄丢了。祖母气哭了，把我打了一顿。不过所谓打，只是象征性的在屁股上摸了几下。或许毕竟不是亲生的，打起来总有些顾忌。在我的记忆里，祖母是慈祥的。

一九五六年，祖母回到乡下。她得了水肿病，一直治不好。其实也没有怎么治。那个时候，有病大多时候是拖着。忌口可是很认真。母

亲每餐为祖母另备一小碗无盐的菜，放在灶角。母亲似乎不情愿做这些，表情总是冷冷的。她们婆媳常有龃龉，互相生闷气，但从没有听她们大吵过。

有人说，乌鳢可以治水肿，我和季陶就为祖母去辟乌鳢。家门口的的小河里，各种鱼都有，乌鳢多的是。河湾水缓的地方，水常较深，水草茂盛，河岸又多凹洼的洞穴，是鱼栖息的好地方。有一次，我们选了一个河湾，筑起一道堤障，圈出一个小潭，辟了半天，水渐渐少了，鱼在里面乱窜，季陶性急，未等水全干，就急着去摸，一条大乌鳢从堤障上冲了出去，气的我们拍胸顿脚。这事让我们遗憾了很久，因为祖母没有吃到乌鳢就去世了。

这件事季陶也一直记得，我们送姐姐上山时，他还向我提起过呢。那已是半个世纪前的事了。

祖母不是死于病。

五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下午，我坐在卧室的窗前看书。那间卧室里放着两张床，床上挂着蚊帐。我、季陶和祖父母住在这里。祖父母的床头和墙之间放着一只尿桶。我们白天黑夜都在此小便。农村都是这样，臊惯了。

我正看着书，突然听见身后有响动，回头一看是祖母，见她喘着气走到尿桶边去。过了很久，大约半个钟头，还不见祖母离开，我感到不对头，就赶快到厨房去告诉大人。厨房里母

亲在炒菜，祖父在灶下把火。我对祖父说：“婆婆在尿桶上屙尿，屙了半天还不起来。”祖父一听，刹时变了脸色，立即跑进卧室。

祖父一进去，就听见他一阵惊呼：“格姆妈（祖父这样称呼母亲），快来呀，不得了哇，婆者吊死啦！”

母亲和婶婶应声窜了进去。

祖母真的死了。

我不敢去看现场。听祖父说，她是用一根布带子吊死的。她把带子的一头套住脖子，一头栓在床头的横杆上。横杆不到一人高。脚不可能悬起来，怎么能吊死人呢？估计她是采取把身子扑下去的姿势被勒死的。

大凡吊颈，只要脚一悬，不想死也得死了。而采取祖母这种方式，人在十分难受时会本能地立起身的。而祖母没有。可见祖母死的决心有多大。

祖母为什么要自尽？是因为对病绝望了，还是别的原因？我不太清楚。也从没听大人们议论这件事。

其实，答案也许并不复杂。这些年来，家庭遭这么大的变故，祖母的心境肯定也是极是悲苦的。现在水肿又日重一日，眼看决无痊愈的可能。依照祖母的性格，她走这条路一定早有预谋，决非一时的冲动。祖母自尊心很强，她是不愿意麻烦别人的。

家里觉得长辈吊颈，总是很不光彩的，所以我

们一直瞒着村里的人。

那时，我们住在庙里。刚住进去的时候，进门就是殿堂，上面放几尊菩萨，东倒西歪，还堆着乱七八糟的东西，灰尘有几寸厚。我们小孩子非常害怕。祖父把台子拆了，装修成了我们的卧室。外墙新开了两个大窗户，装了玻璃。室内窗明几净，室外是稻田、青山，虽然没有邻居，但春风秋月，不嫌弃我们。我们偏安一隅，一家老小过得自自在在。我们的居室不亚于梁实秋的雅舍。

没料到发生这样的事！

父亲

父亲去世快三十年了，他孱弱慈祥的形象常常在我的脑海中出现。

母亲死得早，她的音容笑貌已经有些模糊了，而父亲则不同。之所以如此，是几个兄弟和姐姐，气质外貌都有酷似父亲的地方，看着他们和自己，每每令我想起父亲。

说我们子女酷似父亲，有一件事可以证明。1980年代的某一天，大哥伯陶在罗田的马路上行走，一陌生老者迎面而来，竟问：“大子宝，你到哪里呀？”。“大子宝”是解放前人们对父亲的尊称。那位老者忘了光阴荏苒数十年，恍

惚中错把伯陶当成父亲了。

父亲名乘礼（1908.10.11~1980.4.20），字雅言，号诗怀。吉州（现吉安）公立阳明中学毕业。

父亲是过了继的。也就是说，他名义上不是祖父的儿子，而是过继给了伯祖。原来祖父有三兄弟，老大老三都在十多岁就夭折了，当然也就无后。根据传统，长子要过长房。这样，1947年第六次修村谱时，父亲过继给了老大，只有叔父才是祖父的儿子。而叔父自己却没有儿子，所以又反过来把父亲的儿子过继给叔父。为什么一下子把又陶和我两个儿子过继给叔父？原先我以为是父亲和叔父感情特深厚，连儿子也平分。（那时老五梅陶还未出世）。其实父亲是怕过继一个不保险。弄不好祖父这一支反倒绝后了。所以一下子就过继了两个。此事恐怕罕见。

这可能也是祖父的意思。过去，绝后是个很严重的问题。

1979年我因申请入党，需要详细交代家庭情况，再次向父亲询问解放前的历史。他给我回了一信，下面是信中的一段话：

“解放时你才5岁，家里情况当然不了解。解放前我家约有土地300多亩，在峡江县城开了粮食铺一所，牌名体记，解放前一二年，全部人口迁回乡间，无人支管，从此歇业，让与本村日华（后来成了梅陶的岳父）经营，另在乡间开设药铺一家。家里雇佣劳工五六名，耕种

田亩约百余亩，其余出租。全年纯收入可约稻谷二三百担。我在峡江、高安、五区专署（署址景德镇）任过伪科员五六年，抗战时我正患肺病，在家养了三四年，后在新干田粮处担任伪第一科长和秘书约半年，又因患病回家，以后担任义务伪职参议员至解放时止。你叔曾任伪高安县政府雇员浮梁县政府伪合作科科员及伪五区保安司令部科员，及峡江县金江乡乡长等职。以往旧事本不应提，人家看到，恐怕误会我们留恋过去，因为供你陈述、坦白，不得不回述一下，以备参考。……在新干前还担任峡江行政常驻会总务组任组员和第二区暑区员共一二年。”

这段话，扼要地介绍了解放前我们的家庭情况和父亲叔父的经历。

提起出身，那是我一辈子的痛。都说我们是大地主，有钱有势，其实算什么呀。在我读书期间以及日后到了工作单位，填过不知多少次履历表，次次要填家庭历史和社会关系，次次都是折磨。但从小受着“对党要忠诚老实”的教育，点点滴滴，从来不敢隐瞒。忠厚老实的父亲，因为自己的经历吃了那么多的苦，也不知道教儿子学乖一点，也没有哪个好心人给我点拨一下。其实许多乱七八糟的事，自己不填鬼也不知道。而如实的填，自然严重影响自己的前途。在诡谲多变的人世间，太老实是不行的。鲁迅说，忠厚乃无用的别名，真是

至理名言。后来我知道，有许多人，对自己不利的关系都隐瞒不填。连大汉奸出身的江泽民都隐瞒了一切，最后当了党的总书记。当我把自己的家庭情况填在入党志愿书上时，入党介绍人、院长邓桂生把要害问题都给划掉了。一时竟让我开了窍。邓当过几年公社副书记，为人圆滑，假话连篇。人称邓鬼生。他活到88岁，他在遗嘱中交代，要把他的死讯通知久未联系的生前好友，以示永诀。名单中有我。他把我当成至交了。愿他在天堂快活！

父亲这一辈子，可以分成两个时期来说。

40岁以前，即解放前，在国民党的政府里曾谋得一官半职，按照现在的级别，应该相当于科级吧。也算得体体面面，也算得发了一份光和热。但除去生病，干事的时间不过十年左右。父亲有个上司叫酆景福，丰城人。酆脑子非常灵活，年轻时曾在国民党元老陈果夫家做过佣人，深得陈家赏识。因为这个缘故，他们让酆景福从县长做起，一路飞黄腾达，后来到台湾当了国民党的秘书长，那是一个不小的官。酆1962年去世。父亲从《参考消息》上看到这则消息，浮想联翩，唏嘘不已。想像着当年若是跟着去了台湾，今天会怎么样怎么样。

父亲为什么有如此想法呢？因为酆景福当县长时，父亲是他的秘书，颇得酆的赏识，后来跟随他多年，成了他的亲信。酆任行署专员的时候，曾准备来我们家做客。祖父觉得这是非

常脸面的事，特意在离村子二三里的山林里做了一栋别墅来接待他，取名石泉别墅，后因抗战，没有成行。

说是别墅，也不过一栋普通的民居而已。风景却非常秀丽。屋前面是一口池塘，几丘水田，再前面是一条长堤，堤上一片竹林，象一幅屏障，和外面的世界隔开。后面是一个花园，有各种果树、花草。家里请了一对老夫妇看房子。崇山峻岭中有这么一个去处，真象世外桃源。

后来祖父在这里办了一个小学，叫振华小学，曾经有十多个本村的小孩在这里上过学。解放后多年，我还看见壁上贴有当年的课程表。就在别墅的周围，祖父栽了几百亩的茶树。土改时分给了贫下中农，没过几年，收归集体，后来又重新分给各家各户，我们自己也分得数亩。六十多年来，这片茶林，是白港人吃油的主要来源。至今还在结果。

父亲在新干的时候，新派来的县长是个丘八（丘八是过去对兵的蔑称），一字不识，县里的公务实际上都是父亲主持。父亲曾自豪的说，大约有半年的时间，县长其实是他。这大概是父亲一生中最辉煌的岁月。

40岁以后，经历土改、劳改，之后是种田，历尽辛酸苦难，包受凌辱折磨，窝窝囊囊可怜兮兮的过完后半辈子。

窝窝囊囊的父亲，人格是高尚的。他为人忠诚

老实本分厚道，宁肯人负己也不肯己负人。他的后半生，常常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所以无暇顾及对子女的教育。我们只是在琐屑的日常生活中，耳濡目染的接受父亲的熏陶。父亲很少空洞的说教，也不虚伪做作。我们兄弟在人品操守方面颇为世人称道，主要是受父亲的影响。这是代代相传的家风。

因为曾祖父中过秀才，后来父亲叔父又是读书人，所以在乡人眼里，我们家是书香门第。那时村民大都是文盲，所谓书香门第也只是相对他们而言。就是土改前，我也没有看到家里有什么藏书。土改后就连一本书也没有了。我们小时候根本就没有闻过书香味的。

不过，父亲是个喜欢读书的人，随便碰到一张报纸或任何一本书，都饶有兴趣的拿来反复看看。这对我们是有影响的。父亲书生气很浓，他的字写得不错。虽然他们那一辈人，但凡读了几年书，字都拿得出手，不过多显得俗气，而父亲的字有书卷气。但他没有手把手教我写字，却多次给我讲王羲之教儿子写字的故事。说儿子写字的时候，他在背后把儿子的笔拔出来，结果儿字抓得紧紧的。意思是写字要死死的握紧笔。这个荒唐的故事流传甚广，不知害了多少人。我就是深受其害者。所以练了一辈子的字没把字写好，深以为憾。

晚年，父亲爱写些旧体诗，来抒发胸中的愤懑和悲哀。一个叫张文清的南昌人，下放在白

港。此人戴的帽子是坏份子，群众说他是轻骨头，也就是爱搞男女关系，屡教不改。他可是个阅历丰富的老革命，曾在新四军里干过，曾任副总理的方毅当时是他的顶头上司。张下放前是南昌某厂的一个科长，五六十岁的样子，背有点驼，也许因为落魄，人显得很委琐。他常偷偷和父亲往来唱和，成了诗友。这是他们在逆境中难得的一点快乐。父亲给我看过张的诗，比父亲要技高一筹。张没等到平反就死在白港，埋在一个小山坡上，连墓碑也没有，仅在坟前竖了两块砖头，以至若干年后儿子来扫墓时竟找不到地方。

父亲文笔不错，常有写作的冲动，以给子孙留点家史。但被耳闻目睹的许多文字狱式的故事吓怕了，不敢动笔。我则后悔没有支持他。

父亲多次跟我讲过，年轻的时候因常生病，曾多次想学医。但拿起医书，怎么也看不懂，苦于不得入门而不得不死了心。解放后他看见姻亲湍清当医生很吃得开，还在后悔没有学医。本来，“秀才学医，笼里捉鸡”，只要有点文化，买本《汤头歌诀》，依样画葫芦，学中医学其实也不难。许多民间中医就是这样学出来的。不知父亲曾经看过些什么书，致使畏难而退。或许他过于谨慎，不敢跨出第一步。鲁迅曾经说过，中医是有意无意的骗子，看看世上那些医生，这话不是没有道理。做医生要靠一张嘴巴，要敢于说大话，敢于吹，敢于打包

票。病人就喜欢这样的医生。倘若一是一，二是二，甚至过于谦虚，说话留有太大的余地，便难以吸引病人。象父亲那样本分的人，就是做了医生，也难得出名。这方面我是有体会的。

父亲年轻时多病，村里人都认为他活不长，甚至有人愿意用几斗米来打赌，说他连几斗米都吃不完就要走人了，当然这只是玩笑。父亲早年得了严重的遗精和肺结核，治病花了不少钱。母亲常说她十四岁嫁到王家，父亲比母亲还小一岁，那么父亲十三岁就成婚了。

也许早婚影响了父亲的正常发育。他的身体非常单薄，肩不能挑手不能提。40岁以前的形象我不知道。他40以后，我有记忆力了。在我的印象中，他一直是副衣架子的样子，面颊深深陷下去，下巴尖尖的，有点八字脚。他是读书人，书呆子味很重，古板迂腐。年轻时在外多年，干的是脑力活，从未下过田。解放后做了地主，人到中年来学农活，吃苦不言而喻。现在来回忆父亲，记得起的事情已经很少了。最早的记忆，是父亲那次挨斗。

1951年冬，一个打霜天的夜晚，北风呼啸，月光凄清。父亲被人从斗争大会上背了回来。他刚刚被浇过冷水，冷水从头顶往下泼，里外湿透，冷得瑟瑟发抖，不停的呻吟着，牙齿碰牙齿，发出咯咯的响声，说话已含糊不清，身体都僵硬了，主持会场的人怕他会死掉，才派

人背了回来。等候在家的母亲，哭都不敢哭一声，只是长长的叹了口气。急忙烧了一炉大火，父亲半天才恢复过来。这情景终生都印在我脑子里。

这年冬天，许多地主富农都被斗得死去活来。土改后，我们住在学堂多。这个“多”字，既是词尾，又含有“里面”的意思。我们的口语里常带一个多字。如“田多”、“菜园多”。学堂多的坎下，是一个大菜园，有几棵梨树。其中的一棵梨树苑下，埋过一只很大的死狗。因此这棵树生长特别茂盛，结的梨又多又好吃。53年仲夏，梨才有荸荠大，我和季陶就开始偷吃。有一次，父亲抱着已经三四岁的梅陶在屋外来回走动，发现我们在偷梨，便大惊失色的追我们快走。我们装做乖乖的样子离开了。但过了一会，父亲转回来，看见我们正在啃着还只有青草味的涩梨子。大骂“婊子生个死崽”，并在我们每个人头上来了几个“栗壳子”。我们的头顶上顿时火辣辣的，起了一个不小的包。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行为很严重，不单是偷几个青梨子的问题。这个菜园曾经是我们家的，现在已经分给他人。孩子们到园里去摘梨，硬说是大人怂恿的，是反攻倒算的表现，那大人非挨斗争不可了。贫下中农要整我们，还找不到借口呢。本来胆小懦弱的父亲，那个时候常常如惊弓之鸟。

父亲骂我们的口头禅是“婊子生个死崽”，怨

罚我们的手段就是给几个“栗壳子”。所谓栗壳子，就是弯起四指，用四个指头的第二关节往头顶上敲打。打起来又顺手又方便。很痛。但父亲不是粗暴的人，不常打我们。

土改以后，父亲开始下田干农活了，那时还是单干，他只是跟着家人下田，能干多少是多少。但就是这样他也吃不消，几次在田里晕倒而被背了回来。那时祖父60多了，以前也是不干农活的，但他的身体尚好，能适应这种巨大的转变。

53年冬，父亲去东北劳改，据他回忆，在劳改农场倒还比较轻松。那时确以改造人为主要目的，对犯人颇为仁慈。回到家乡就不同了。本来，只要体格好，50以后学干农活也不晚。但父亲不行。主要农活，如抄田、耙田、插秧等，一辈子也没学会，只能和妇女一样，做些打杂的事。论效率，比不上一个中等劳力的妇女。

农村记分的方法，劳动力最强的记10分，半分一个级别，一般男子，有10分的，9分半的，9分的，年老体弱的，七八分，而父亲只能得4分半，好象没得过5分，和婶婶差不多。叔叔比父亲就强些，可得到八分或8分半，妇女最高分是6分。文革以前，评工分虽然也有人情面目，四类份子多少会吃些亏，但基本上是比较公平的。在农村，能干农活才是本事。

所以在人们眼中，父亲几乎是一个残疾人，一

个废物。人人都可欺负、鄙视他，被队里大小干部训斥更是家常便饭了。

父亲曾经是场面上的人，见过不少世面，也是有脾气的，但落难到这种地步，只好唯唯喏喏了，有时嘟囔一句，也不敢让人听见。

好在他有五个儿子，有福气，这一点又没有几个人比得上他。让人在内心深处不得不羡慕死了。

自从一解放，作为一个四类份子，就没有了做人的尊严，人人可以欺负可以侮辱，有错没错，常常会无端被拉出去斗争一顿。在阶级斗争这个大舞台上，他们永远是反面人物，永远有罪，永远是小丑。有了他们作陪衬，贫下中农就有了翻身做主的感觉，尽管生活并不比解放前好。

记得1968年春，永无休止的批斗，使人厌烦极了。我借养病为名从中医学院溜回家里。

那天，中午时分，父亲从外面归来，一见是我，非常的意外和高兴。他自我解嘲似的说：“错娘个，又到游乡。”这一次，他的罪名是“带头打土砖，破坏农业学大寨”，他被强迫背着两口土砖从白港走到公社所在地，又在附近的田港里转了一圈。他一个四类份子能带什么头呢，他有半点号召力吗？分明是以莫须有的罪名整人。

土砖是用稀泥做成的枕头样的长方体，一块有20多斤重。土砖不用烧，盖房子又快又省

钱。农民用土砖盖房子是很普遍的，一代一代都是如此。打过土砖的田，肥力是要差一点。但比起盖一栋房子，那又算什么呢？上头要禁止打土砖，然而禁而不止，就以斗地主的方法来威吓群众。真是可笑。地主是死老虎，贫下中农会怕么？根本没用。

一个快60的孱弱老头，背四五十斤东西，游来游去，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也许这样的事经历多了，父亲一点也不感到羞辱，倒象刚刚结束一次演出，拍一拍身上的土灰，就和我谈笑风生。他们这些人已经没有荣辱的概念了。

父亲这一辈子真可怜。

母亲在世的时候，老夫老妻，相濡以沫，但人总是有脾气的。母亲有气无处发泄，对父亲则动辄训斥喝骂，父亲只有一脸阴沉噘着嘴巴生闷气，很少申辩。一个懦弱的人，老大无能，常常内外受气而无处诉说。但毕竟是夫妻之间，转眼就没事了。而翁媳之间就不同。母亲59岁去世，那时父亲才58岁。此后十多年里，父亲尝尽了一个鳏夫的苦楚。那时我们虽然都早已娶妻生子，却不了解父亲内心的孤独和寂寞，没有给予应有的关心。

1978年11月11日，是农历戊午年十月十一日，父亲七十大寿。那一天，我从桃溪回坑里探望父亲。

文革后期，全国有一次数千万人口的大迁徙。干部叫下放、知识青年叫上山下乡、四类分

子叫遣送。遣送的理由就是便于对这些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父亲便被遣送到了坑里。季陶夫妇因为受株连也跟着去了。叔婶被遣送到了七八里外的樟木桥，又陶夫妇也被株连去了。

坑里距白港十里，是比白港还小的村子，不过二三十户人家。从白港去，要经过一个山坡，坡上一片大苦株树，拱卫着这个小山村，是一道美丽的风景。从县城方向去，要过一座石拱桥。这个村子的房屋多为砖墙，多为解放前的老房子，总体说，过去比白港要富足些。

父亲他们租住别人的旧房，一厅数间，还宽敞好住。他们去以前这房子空着，厅堂是做牛棚用的，关着一头牛。文革已经过去，坑里人对父亲没有什么过分的举动，倒是很欢迎季陶这个强劳力。洁正上学以前，5岁多的时候，在坑里住了几个月。父亲和季陶曾多次要我把洁正送回去，以减轻我们一点困难。那时罗米没有城市户口，吃粮还没有着落。我每月会寄15元钱给他们，季陶回信总是说“不用寄。”季陶的感情是很真挚的。

那天，父亲坐在灶前，从灶里扒出几个毛芋头。毛芋头挺烫手，烫得父亲不停地在两只手上传来传去。父亲一边用嘴吹去芋头上的炉灰，一边象是自言自语又象是告诉我，说：“今天满七十，煨两个芋头庆贺庆贺。”说话时，父亲虽然面带微笑，话里却含着苦涩和酸楚。

几十年来，我们卑微的活着，不仅这个社会不把我们当人，我们自己也不能看重自己。我们没有为家人过生日的习惯。但今天是父亲的七十大寿呀。父亲一生体弱多病，又历尽坎坷，活到七十岁不容易，作为子女，应向父亲祝寿，哪怕一点简单的表示，一句祝福的话。而我当时竟无动于衷。事前不知情已不能原谅，现在父亲明明白白的告诉了自己，更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后来我一想起这件事，总会感到非常愧疚，直到现在。

人到什么时候才能懂事啊，非要等到子欲养而亲不在吗？

父亲只有自己庆贺了，这一天他写了一首诗：

七十生日感怀偶成顺口溜二则以示儿曹

父母生己应称庆，稀龄犹放作流人。窃为兰桂相竞秀，奋志立业创革新。

腐朽昏庸无能为，每思彻宵不能寐。鹑衣菲食仰嗟来，折磨岁月胡不归？

从家乡白港遣送到坑里村，快十年了。虽然白港人对我们并不友善，但到外乡，就更多了一层隔膜。作为老年人，落叶归根的观念很重，总希望能及早搬回老家去。

父亲对我们几兄弟还是比较满意的。如果他老人家能够看到孙辈一个个考上大学，更不知道有多高兴了。

鹑衣菲食仰嗟来，父亲的确有很多不满的地方。父亲没有亲口对我说什么，后来婶婶告诉

我，媳妇锦云对父亲很少有好看脸色好口气。所以父亲会觉得这是“折磨岁月”，不如死了好。79年，父亲去过一次桃溪。那是送伯陶的大女儿青萍来新干读卫校，借机在桃溪住了几晚。我们父子从县城搭了一辆货车，站在空车厢里摇摇晃晃。行至沙口，车子转弯过急，父亲一连几个趔趄，差一点摔出车厢，脸色都青白了。

年初，父亲曾因少量咯血在峡江县医院拍过片，发现肺部有阴影，注射过青霉素、链霉素之后，阴影无明显缩小。医生怀疑肺癌的可能。在桃溪的时候，他还是常常痰中带血。所以他每吐一口痰，总要观察半天，甚至用树枝扒开反复细看，是不是混有血液。父亲很怀疑是肺癌。由于当时胶片紧张，我又在桃溪，求县医院的医生开一张X光片都很困难。我想，纵是肺癌，也没有任何办法医治，反而造成精神紧张，不如不去追究。话这么说只是貌似有理。作为医生，没有帮父亲把病诊断清楚，我太对不起父亲了。

父亲在桃溪只住了大约十天。我那里有许多书，如《人物》之类的杂志，他很喜欢。他是喜欢看书的人，但平常很少有书可看。父亲觉得，有书看，又不要做事，真是神仙过的日子。但当罗米要回峡江办理转商品粮手续时，他又住不下了，跟罗米回峡江去了。回去后他写了一首诗寄给我：

一九七九年己未中秋桃溪归后寄秋陶

桃溪小住乐悠悠，菽水承欢意气稠，膏丹何济
长生术，妙手难纾不老忧。

粗粝充腹已不易，薄衾遮身莫殊
求。浑浑噩噩得且过，潦倒无计慰孤幽（指母亲）。

那时我一家五口，每月约80元收入，罗米的户口没有解决，吃粮没有着落。父亲总是为我们面临的困难担忧。那时市场上的物质仍稀缺，荤菜不易买到，我们尽量在菜里间点鱼肉招待父亲，这已经很简单了，父亲还是觉得太破费了，反让他住得不安心。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处处为他人着想，哪怕在子女面前，也总是以少添麻烦为准则。他说“桃溪小住乐悠悠”是真的。只是对自己的病很是担心，除此以外，一般情况尚不错。

父亲回到峡江，正逢国庆，县城举办物质交流，大小商店都把各种商品拿出来卖，大街上摆满了小摊。那时物质十分匮乏，商品供不应求，一遇物质交流，一县的人都往街上涌，热闹极了。父亲希望姐姐替他买条裤子，姐姐带着他挑遍了大小商店和各个摊位，总找不到一条合适的裤子，最后终究没有买成。父亲嘴里不说，心里却很气愤，跟我讲过好几次。气姐姐小气，舍不得。

姐姐小气是真的，说对父亲没有感情也不是冤枉她。父亲去年就曾给我写过一信，表示他

的不满。信中说：

“我最近脚肿，又已不药而消，看来完全属虚肿，无关健康。不过膝腿仍有酸软（比前些时好点），饭量也与体旺时一样。可能是 B1 的功效。我前次不是说了准备把 B1 吃个满足。上次季陶去（县）城要你姐再在弄点，（因为城上金滩都缺，弄不到），她是事忙，下次锦云去城，问她买好了 B1 没有，她说，我懒得，横竖吃不了两年饭。这话倒很痛快，她希望我早点死，倒是我乐意的事，免在人间折磨。我也知道，自己形骸污秽，对你们蒙受了莫大的耻辱，同时在世一天，或多或少要破她一点钞。最近二三年，我因穷而无告，每年的布证，是要她替我掏腰包，但我觉得每次都是吝三吝四，打折扣，买廉价布，一穿即破。假使我死去的话，这个意外开支是不要再化了吧。说起来是好气，不足为外人道也。话得说回，人家没有这个女也要过，还过得好些，我想到等于没有女，不是一样过吗？简直是陌生路人一样，没有一点感情。”

这一次，不仅裤子没有买成，又遭到张德馨的羞辱。父亲写了两首诗：

无题

狰狞面目不可亲，冠带依旧未能新。长庆老郎官阶终，枉自矫揉起鸟劲。

（嘲笑面目狰狞的女婿，死心塌地，也枉费心机，得不到提拔）

无题

儿孙居陋巷，委顿难容膝。女家居庙堂，巍巍不可攀。欲求充辘肠，宁作沿门乞。金玉有其外，嚼之如败絮。寄语牢骚者，守身莫伊戚。

1980年4月2日，中午，我正在厨房炒菜，罗米从外面拿来一份电报。我心里一阵紧张。那时候，县与县之间没有直通电话，有急事只能拍电报。所以接到电报不会是好事儿。我下意识的想到父亲，急忙打开一看，果然不出所料：父病，速回。

我准备立即回去。罗米提醒说，现在晚了，到新干也没有车，要住一夜，不如明天再去。

第二天是个阴雨天，我们一家四口乘车到新干，本来可以转乘樟树至峡江那趟班车，不巧那趟车在新干抛锚，我们只好改乘去吉安的车到水边。在水边，我们和另外几位乘客强行拦了一辆去峡江的货车。我急忙爬上车去，先将磊莘抱给一个搭车人，罗米在车下再把亚正递给我，我正弯腰接住，车子就开动了，我又紧张又慌乱，差一点手就松了。若手一松，亚正就完了。这件事让我十分后怕。

而罗米终于没能上车。这时下起雨来，我为了关照两个孩子，在车箱中被荡来荡去，狼狈极了。

那时开车的非常傲慢，常常不顾搭车人的死活。他们的态度是，出了问题活该，谁叫你强

行拦我的车！那时法制很不健全，出了事也只有自认倒霉。

4月4日早上我回到白港。

父亲病了几天，身体很虚弱，卧床不起，思维迟钝，话也说不清楚了。兄弟们见此情景，才打电报要我赶回去。

父亲的病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自从去年从桃溪回来，就一直没好过，不过近日因感受风寒而加重罢了。请城上卫生院彭德平看过，服过归脾汤后呕吐，痰涎很多。他连我也认不清了，问他哪里不舒服，答非所问，如在梦幻中。我考虑是痰饮所致，一方面用张仲景治痰饮的方子，一方面用青霉素链霉素抗感染——当时抗感染最强的就是这两张王牌了。

4月15日，父亲病情急转直下，到了晚上，只偶尔有点出气，我们都以为再也不能挽回了，便围着他大哭起来，任凭他蜷缩着歪躺在睡椅上。季陶看见父亲这个姿势，心有不忍，赶快把他的身子扶正了。我们五兄弟守护了一夜，只等父亲落气。

没想到父亲凌晨又苏醒过来，但只是苏醒而已，一般情况很差。

这些天，五兄弟一直守着父亲，姐姐也回来了。大家都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我在家里治疗了十八天，使尽浑身解数，病情时好时重，江河日下。

这时，桃溪需要我赶快回去，我不能在家里再

住下去了，于4月20日离家回新干。明知这是永别，但想到这一天总要到来，也就平静地走了。而插秧在即，农事不能再耽搁，兄弟们也都很着急。这样，忙过一阵之后，大家都失去了信心，觉得再治怎么费神也无济于事，于是从此就在城上医院里开些药，尽尽人事而已。父亲本应享受到更好的医疗，尽管难有回天之术。但我们这些做儿女的，没有谁提出要把父亲送去县里看看，今天想来，说不过去啊。话又说回来，当时农村的情况，大抵如此，往县城治疗的人很少。主要的问题是钱，那时一般家庭多数拿不出来。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人，还怕死在外面。今昔对比，不可同日而语。根据父亲的病状，他得的是肺癌。他不抽烟不喝酒，没有不良嗜好，为什么得肺癌呢？资料上有这样一种说法，肺结核在愈合过程中形成的瘢痕，日后可能癌变。父亲也许是这种情况。

父亲在弥留状态中又活了一个多月。

6月2日，我在乡下搞计划生育，6:40，粮站沈德珍带来父亲去世的消息。我赶紧回到医院，收到梅陶早上6:10发来的电报：父亡速归。这消息没有什么意外，我和罗米稍事收拾即回峡江，在县城住了一夜。

翌晨6点，我们才从砚溪方向回白港去，姑母也在砚溪上了车。

父亲的灵柩停在祠堂里，等我们回去再封棺。

我们一下车立即去看父亲。季陶正守在那里，眼皮都哭肿了。我们几兄弟最重感情的是他。他打开棺木，我看见父亲两眼深陷，身子缩得很小，只剩下一副骨架子。右锁骨上可见一荸荠大淋巴结。这是癌症淋巴转移的证据。根据病史，我相信父亲是死于肺癌。从痰中带血到去世，有一二年的时间。

来到伯陶家，大家正忙碌着。碑石已刻好。父亲的衣被几被淑英一烧而光。因为父亲年岁大，又病了这么久，没有引起太多的悲伤，丧事在平静中进行。坟地选了几个地方，开始有一点小小的分歧。俊昌、明达认为今年东西利，南北不利；叔父等则认为不见得。商量的结果，最后决定葬到海坑去。

海坑离白港有三四里，模范里小学对面，中间隔着一片田港，田港那一边是石下村。海坑这片山的归属很奇怪，山上的竹木属于石下村，白港人无权砍伐，而山的所有权归白港，白港可以埋人，石下村则不能。这种怪事不知因何而起，但到今天还维持现状。

据说这块山风水好。解放前几年，湍清的父亲死，湍清看中了这个地方，就对父亲提出了要一座坟地的要求。湍清的哥哥是父亲的姑父，也就是我们的姑爷，是离得很近的亲戚。那时我们家有钱有势，父亲不加考虑就答应了。这是一村的祖坟地，当时群众敢怒而不敢言。没料想，文革中旧事重提，激起民愤，父亲挨斗

不算，造反派硬是逼着他把张的墓碑挖了。

那是1968年春，一天，我从南昌回到白港，正和父亲闲谈，乾乐气势汹汹地跑到家里来，说：“我要扇你这个叫花子几个耳光，你不赶快去把湍清爷子那顶墓挖掉，你死都会死！”

他虽然没有动手扇就走了，但也等于扇了，不但扇了父亲，也扇了我。父亲是错了，祖坟地好比国土，任何个人都无权送人的。人不应该在得意时忘乎所以。而乾乐用得着这样嚣张吗？

那一幕让我记住一辈子。

办丧事杀了两只猪，一只是伯陶家养的，另一只是买的。晚上在祠堂举行了传统的祭奠仪式，是资言叔念的祭文。来客约十三四桌。湍清也来了。他比父亲小几岁，我们称他湍清叔，其时他身体尚好，红光满面，举止不俗，是个颇有风度的人。他劝慰我们“节哀”。

湍清因为学了医，在乡里颇享声誉，但文革中还是受了很多苦。真是“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文革”。后来得了前列腺癌，在病重时因为医生不慎又造成股骨骨折，备受折磨。

1980年6月4日，阴转晴。凌晨，父亲出殡。

到葬地海坑的时候，天刚蒙蒙亮。墓穴已经挖好，我们望着棺槨徐徐放进墓穴，这一刻心情顿觉沉重。下棺以后，按照乡俗，大哥向墓穴里洒了几把土，大喊：“爸爸，快走啊，土来了啊。”连喊三遍之后，丧夫们从四面将土填

进墓穴，转眼即现出一个墓堆。阴阳两隔，逝者逝矣！

下葬时哭得最厉害的是叔叔。他只比父亲小一岁，他们兄弟感情深厚，远近闻名。叔叔没有儿子，父亲一下就过继两个给他，这是闻所未闻的。父亲和叔叔一起生活到1962年才分家。此刻，叔叔的感情，应是非常复杂的。我们几兄弟问他，叔叔百年之后也葬在父亲身边好吗？叔叔点了点头。十五年后，叔叔也就长眠在父亲的身旁。

母亲去世的时候，各项丧葬事宜包括经费是几兄弟共同负担的（我在南昌未回去，也无力承担什么。）父亲当时考虑到大家生活都很困难，突然发生这样的事，四兄弟一起承担，担子就会轻些，于是提议以后他们三位老人（父亲、叔婶）均由四兄弟共同负担。梅陶过继给了祥言，他有他自己的责任，故不要他参与。老大老二老四都同意了，所以父亲丧葬用的费用四兄弟照摊，大概每人也不过50多块钱。

父亲没有遗产，也没有留下什么遗物。父亲病重时亲友送了些补品如麦奶精（当时是最流行的探病的礼品）之类，有些吃掉了，没吃完的以及一些兵铁包装，有姐姐经手，叫几兄弟都拿了些。现在看来这些不值一提的东西，在当时还是为大家所看重的。

6月6日，阴雨上午，我们五兄弟去封了山，下午我离开白港回新干。

附：父亲的诗

父亲一介书生，忠厚善良，谨慎懦弱，却长期被视为罪人，备受折磨，活得无尊严可言。晚年，他曾想为后人留下一点文字，诉说平生万千酸楚。惜斯时文革遗风犹存，心有余悸，我未敢促成此事，深以为憾。以下是他留下的几首诗。

兄弟合影（父亲和叔父）

手足骨肉亲，福祸共甘苦。垂老到白头，情意胶漆融。

人称元季方，虚膺美好项。但愿子子孙，克绍旧家风。

予与乃弟乘殷共患难，共进退，于财于义，两相尊让。从糴祿的白头，毕生无微言，人称难兄难弟。兢相自守，毋负人誉。崦嵫岁月，存日无多，持合一影，遗以为念，藉树风范。冀尔曹继承传统，敦笃友于之谊，以副予愿。是所厚望，书以诸儿存勖。

时在一九七八年丁巳腊八父志于坑里

自题七十小影

浮沉四海外，孑然唯一身。雏燕分飞离，幽冥俛双亲。

题忘妻杨中和

诀别逾十年，苦水积万斛。梦短诉难尽，相期黄泉路。

复秋儿

老莱娱亲见今日，心情振奋胜参芪。那得有子
诚如你，可望延年到期颐。

（父亲寄诗于我，哀叹存日无多。我未曾作过
诗，为劝慰慈父孤凄之心，勉强凑成一首，云：
“存日虽无多，体健儿孙喜。年少多病时，敢
望登古稀。重生赖党恩，劳动胜参芪。莫谓日
已西，
余辉亦绮丽。四代同堂日，为父庆八十。”父
亲因作《复秋儿》）

一九七九年己未春节由坑里迁回白港赋此志
感

待罪放逐已十年，故园风物幻流连。英明决策
酬宿愿，邱山正首谢九天。

一九七九年三月廿五日摘帽子

生长旧魔窟，感染一身污。投入大烘炉，脱胎
换新骨。团结搞四化，公权欣有初。残余岁月
里，春风荡沐浴。

一九七九年己未中秋桃溪归后寄秋陶

桃溪小住乐悠悠，菽水承欢意气稠，膏丹何济
长生术，妙手难纾不老忧。

粗粝充腹已不易，薄衾遮身莫殊求。浑浑噩噩
得且过，潦倒无计慰孤幽。

无题

狰狞面目不可亲，冠带依旧未能新。长庆老郎
官阶终，枉自矫揉起鸟劲。

无题

儿孙居陋巷，委顿难容膝。女家居庙堂，巍巍不可攀。欲求充辘肠，宁作沿门乞。金玉有其外，嚼之如败絮。寄语牢骚者，守身莫伊戚。

（父亲从桃溪返巴邱，遭张某羞辱。以上二首乃书愤之作。张一怕连累，二因吝涩，从不把父亲当人看。

所作所为，毫无人味。世态炎凉，不过如此。）

自题七一小影

五官百骸父母遗，羁縻岁月七十一。巧不如人甘守拙，臧否留与董狐笔。

一九七九年旧历己未十月十一日

母亲

母亲叫杨中和（1907.12~1967.7）

母亲前后生育过十多胎，有一女五男长大成人。按照千百年来传统观念，应该是一个有福气的人。然而福气是什么呢？字典上说，福气是指享受幸福生活的命运。如此说来，纵观母亲一生，又谈何福气呢？

母亲37岁生我，算我5岁开始懂事有记忆，那么，母亲42岁以前的经历我只能算是耳闻。她42岁

以后的经历我历历在目，我看到的不是福气，而是苦难。

母亲出生于1907年，那时还是清朝。清政府于1902年就宣布废除缠脚的陋习，而母亲是缠了脚的。她们是中国最后的一批小脚女人。小时候常听母亲唠叨：“我十四岁就嫁到你们屋里，什么苦没受过！”那年父亲只有13岁。今天看来，旧时的婚姻制度，真是荒唐极了。母亲姓杨名中和。父亲有时称呼她为“他娘子”，有时称呼为“中和”。

娘家在南汾村，离白港三四里。在那个只长稀疏小松树的癞痢垌下，有一片青翠的竹林，竹林旁有烟村四五家，这便是杨氏世代居住的地方。

这个方圆几十里的丘陵地带有些特别，除了些长不大的小松树，很少有其他植物。裸露的是红土地。五十年代，上面曾来收购一种叫“铀子”的矿物。这一带的丘陵就产铀子，它象碎瓦片一样埋在不深的地下，一毛多钱一斤。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矿。也许因为这种矿，才使地面上少有植物。那时，满山都是挖铀子的人。铀子的分布有规律可寻，叫做“铀子路”，会挖的人一天可以挖到几十斤，甚至上百斤。我也去挖过，一片片的挖出来，这就是钱，令人兴奋极了。婶婶很会挖，她卖了算是她的私房钱。

挖铀子的时间没有持续多久。

母亲连生三四胎都是女孩。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观念极深的中国，即使是现在，不生男孩，仍是家庭的不幸，何况在七八十年以前呢。尽管母亲嫁在有钱人家，因为没生男孩，日子决不会好过。祖父已经等不得了，准备要给父亲带一个继子，以便传种接代，并物色了一个远房的孩子，他叫俊昌，只是没有举行仪式。这时，父亲和叔父都在景德镇的政府里做事，他们的职务不过是小科员，解放后称之为反动职务，因之而双双坐牢。祖父心想让母亲改变一下环境也许能生个男孩，便让父亲把母亲接到景德镇去。

母亲在那里居然怀了大哥。分娩那天，母亲梦见一个叫花子到家里来，梦醒时便生了大哥。所以母亲总说大哥是叫花子投胎。

这种说法常见于小说，我不知道母亲是否真的做了这样的梦。

自从生了大哥，便一发不可收，十年中连生五个男孩。景德镇是出陶瓷的地方，这是我们名字中陶字的来历。大哥是老大，所以叫伯陶；二哥是第二个男孩，取名又陶；我出生在农历八月，取名秋陶，四弟正月出生，取名春陶便不合适，按“伯仲叔季”的说法，因此取名季陶；五弟农历十月出生，是梅花要开的季节，则取名梅陶。梅花虽是名花，但不见于南方，我到半老时才见过。

母亲大概只在这十年间真正快活过。因为接

连生了男孩，多年的屈辱便代之以自豪了。但婶婶终生未育，每当母亲生了男孩，全家喜气洋洋之时，只有婶婶一人向隅，暗自流泪。妯娌之间难免发生龃龉，因母亲儿女双全，福好命好，往往以此占了上风。母亲的这种优越感常常在婶婶面前表露出来。

我小时候，每当炎夏酷暑，劳累一天之后，母亲常打来一盆温水，放在厨房，然后把上衣脱掉，要我或四弟前去擦背，大呼小叫的：“秋仔（或是季仔），快来擦背！”总要故意让婶婶听见。婶婶自然只有扁嘴的分了。

谁能体会婶婶内心的酸楚呢？

母亲生过三四胎女孩，何以我们只有一个姐姐呢。母亲经常提起，有一个姐姐是在襁褓中被掐死的。那一年，家中突然闯进一伙兵匪，情急中，母亲抱了姐姐躲进床底，因为怕婴儿哭出声来，便死死地掐住了婴儿的喉咙。屈指算来，当是三十年代初的事，那伙兵匪或许是红军了。

其他几位姐姐也在婴孩时期夭折了。其中有死于麻疹的。父亲曾说过，我们两代之中，有数人死于麻疹。那时候，麻疹死亡率极高，人们谈麻色变。一旦麻疹流行，村里一片恐怖，百般禁忌。人们不敢乱说一句话，连狗也不能骂。因为据说狗是花娘娘的母舅；夫妻则要分床而居，否则会亵渎娘娘。尽管如此，流行期间，几乎天天有人用粪箕装了小孩上山去埋。

据说我出麻疹时也是很危险的。

母亲把我们姐弟六人拉扯大，吃的苦是可想而知的。即使是解放前，家里在当地算是有钱有势，乡人都尊称她为大娘子，那时恐怕也谈不上享了福。我能懂事的时候，家里雇了六七个长工，厨房里的事很重，虽然另顾了二个女人做饭，但我记得，操持家务，抚育儿女，母亲一天到晚忙忙碌碌。沉重的担子压在母亲肩上，母亲一生都是劳动妇女，不是享清福的娘子。

一个偌大的家，操持家务的主要是母亲。因为父亲年轻时在外谋生，土改后又在东北劳改。父亲即使在家，也帮不了母亲什么忙。父亲是一个文弱书生，人称“雅言 jia 子”。“jia 子”是当地土话，“jia 头 jia 脑”就是迂腐、笨手笨脚的意思，什么事也做不好。因为这样，母亲对父亲常常喝喝嚷嚷，父亲也只好忍了。

有这么几件事我记得很清楚。

解放之初，体体面面的人家，一夜之间被打翻在地，厄运从天而降，天上人间。东西都分光了，一家人被扫地出门。并没完没了的无所不用其极，逼问东西藏在哪里。偏偏这时候三四岁的四弟得了一场重病，数天来滴水不进，农会的人几次喝令母亲把四弟抛到山上去。祖父也总是说：“算了，算了！”母亲眼泪长流，抱着奄奄一息的四弟几天几夜不曾合眼。四弟的肚子胀得象一面鼓。父亲略知医，用蜜糖

熬浓，揉成一个栓子塞进四弟的肛门。四弟命该做人，在大泻一顿之后居然活了下来。那个方子原来是《伤寒论》中的蜜导煎。现在是无人采用了。而四弟就是靠这个原始的方法救了一条小命。

我小时候多病，但一般不请医生，本来嘛也不是要紧的病。乡间几个医生也远不如现在的赤脚医生。我的病大都由母亲来治。有时候弄个偏方煎了让我喝，更常用的方法，是把食指和中指弯曲起来，用两个指关节夹了颈部的皮肤连扯数十下，扯出几条紫斑。常常经过这么一扯，病便松了。这种方法叫刮痧，属中医的一种疗法。据我的体会，对于感冒、肚子痛、中暑之类的小毛病是挺见效的。有时候，其实谈不上有病，只是想得到母亲的疼爱，便装成无精打采的样子，母亲又是照例扯一顿，并十分慈爱地抚慰一番。

母亲会收惊、喊魂。在数十年前的农村，这是很常见的现象。小孩病了，往往认为是受了吓，丢了魂。这时候，母亲盛来一碗米，在锅里炒热了，再装在一小碗里，上面用一个手帕包紧，贴在胸前不停地划着圈，口中念念有词。到底念些什么，我从未听清一句。母亲的态度十分虔诚和神秘，叫我也不得不庄严起来。炒热的米在胸前抚摩着，还真有几分舒服的感觉。不一会，母亲把手帕打开，就会奇怪地发现，米会对着某个方向一粒一粒地竖起

来。母亲便根据米粒所指，判断出在哪个方向受了惊吓。

喊魂给我的印象更深。

小时候，我们住在村边头，出后门数十步，就是一片松林，连绵数里。解放前族里有规定，哪家有红白喜事，每年可砍一棵松树，除此之外，任何人不能砍树。否则乱砍就要遭罚。由于大家遵守村规，满山都是合抱不过的松树。每逢风和日丽，松涛阵阵，令人陶醉。我十分喜欢这片林子。长大以后，我去过许多地方，也到过一些名山胜景，象这样连绵数里，高大挺拔的松树，的确再未见过。可惜58年以后便砍伐殆尽，成了一片光山。令我十分痛心。

有一次，我高烧不退，黄昏的时候，母亲撩起衣襟兜了些白米，由一位邻居陪着，沿着山间那条羊肠小道走进松林，一边向路边撒着米，一边拖长嗓子喊：“秋——仔，三魂七魄快回来哟，跟米谷神一起回来哟！”就这样不停地喊着，走进深山，然后折回来，仍是一声一声地喊着。傍晚的山村，一片寂静。母亲喊魂的声音随着阵阵松涛，凄厉地送进我的耳朵，叫人感到冥冥之中真有鬼神作祟。母亲回来了，领着我的三魂七魄回来了。母亲进门时，煞有介事地说：“秋仔，过门槛了，进屋去，乖乖哩啍。”并在我的额上亲吻一顿。朦胧中，我坚信病马上就要好了。母亲那分无与伦比的慈爱，令泪水顺着眼角自然地流淌下来。

最让我感到温馨的是，每当我生日那天，母亲一定会用壳壳饼蒸两个鸡蛋给我吃。

在历次运动中，母亲肉体上受的苦不多，因为她是女人。皮肉之苦更多的是落在男人身上。土改时她被关过两天。来叫她的人挺客气地叫她“大娘子”，也没说关她，并声明说不要紧，只住两天就可以回来。土改刚开始，人们还没有弄清土改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态度还没有完全转过来，所以人们给母亲留了点面子。然而我每天要给母亲送饭，母亲实际上被禁闭了两天。

到后来，被吊被打，自然也在劫难逃。但比起男人，还是幸运多了。从解放直至去世，母亲没有过一天的心舒的日子。多少年来，总是说地主压迫了农民，然而，倒是我们真正尝尽了压迫的滋味。一提起母亲，耳边就会响起母亲充满悲伤的叹息声。

那是1952年寒冬的一个夜晚，屋外狂风呼啸，严霜铺地，我和母亲怀着十分恐惧的心情守着火炉，等候着父亲的归来。母亲一声连着一声的叹息，多么揪心啊。直至深夜，父亲被人背了回来，冻得象一块劈柴，舌头僵得说不清话。父亲刚刚参加了一个批斗会，被人用冷水从头顶上一勺一勺地浇了下去，厚厚的棉衣棉裤全被浸透了。原本就十分孱弱的父亲几乎奄奄一息。母亲潸然泪下，却不敢哭出声来。马上替父亲换了衣服，烧了一炉大火，好大一

阵工夫，父亲才恢复了常态。

在滴水成冰的严冬之夜，这是多么残酷的折磨啊。

中年以后的母亲，身材略胖，背微驼，四方脸，沉默忧郁。我想，年轻时的母亲应当是有几分模样的。只是由于饱经坎坷，脸上很少露出笑容。母亲十分辛劳。她要操持十口之家的洗浆补裤，做饭喂猪，下地摘菜，上山砍柴。一双小脚，走起路来摇摇摆摆，终年就是这么劳碌着。

在读初中以前，我看到的，母亲每天要做的事情，清早起来弄饭，早饭之后，先是将一家老小换下的衣服洗干净，接着去地里摘菜或打猪草，然后匆匆赶回家来做菜弄饭，男人劳动一回来，往往等不及母亲将饭菜全部做好，拿起碗来就边吃边等，等到母亲把最后一道菜做好，端起碗来吃饭时，只有残菜剩汤了。晚饭依然如此。尽管这样，母亲毫无怨言。多少年来都是如此任劳任怨。

但我们回报给母亲的是什么呢？

晚年，母亲体弱多病，仍然照样操持家务。在她最后几年，母亲常对我们说，她不知得了什么病，左胸痛，夜里不能向左侧睡。母亲反复地向我们诉说，我们听了竟也无动于衷。有时劝她去点几贴药吃，她每每叹口气：“由着它吧，反正也治不好。”事情就这样拖下去。

大约是1965年或1966年，母亲又得了头痛病。

夜里，每当母亲把家务事忙完，便用草纸卷成筷子粗的纸枚子，蘸上清油燃着，对着鼻孔熏起来。这不知是母亲从什么地方讨来的偏方。母亲用过好多次，恐怕一点用也没有。

母亲为什么要熏鼻子呢？记得她的鼻孔经常出血，流脓涕。后来我想，这就是鼻咽癌的表现。

四十年前，不要说公社医院，就是县医院，医疗水平也是有限的。母亲先是找功甫先、湍清先开过几副单子，一点效果都没有，后来又去县医院看过，病情依然如故。谁也说不清患的是什么病。

1966年的夏天，父亲来信说，母亲的头痛更厉害了，鼻涕象脓一样，要我问问老师，患的是什麼病，我问过在江西医学院搞内科的龙老师，她说，也许是脑脓肿吧，最好到南昌来看看。我把龙老师的意见告诉了父亲，但事情却没有下文。那时，文化大革命就象洪水猛兽，冲击着中国大地，四类分子天天被往死里斗，他们的命值几个钱？去南昌看病岂不是奢望？！母亲在痛苦中挣扎，一天比一天消瘦。1966年，全国风行鸡血疗法。方法是在鸡翅膀的静脉中抽了鸡血注射在病人身上。首创者叫俞济时，他编了一套资料，证明此法百病可医。其实这样做是非常不科学甚至很危险的，但当时没有谁有权威能制止这种荒谬的治法。那时南昌有些医院竟出现捉了鸡排长队等候抽血

的盛况，几乎让医生似乎有失业之虞。

该年暑假，我把鸡血疗法教给了四弟。四弟天天给母亲注射，坚持了两三个月。家里养的一大群鸡都抽过了多次，最后，四弟便抓了别人的鸡来抽血。四弟对父母的孝心，真是我自愧不如。然而，开始似乎有效，接下去就不灵了，奇迹终于没有出现。

1967年寒假，我回到家里，母亲已瘦得不成人样。听父亲介绍，母亲渐渐变得神志恍惚，分不清白天黑夜，认不清家里的人。有时从床上滚下来，就在地上躺着，甚至蜷伏到床底下。父亲掀开蚊帐一看，床上总不见人。为了照顾母亲，父亲在几年中吃了很多苦。

我走近母亲床前，母亲已面目全非，身上瘦得没有一点肉，原来并不矮小的母亲，身材缩得不如七八岁的小孩子，我的鼻子一酸，喊了一声“姆妈，我回来了。”原本恍惚的母亲忽然清醒过来，声音微弱断续但很清晰地说：“崽呀，我就等你回来呀！这下我可以去了，你给我什么药吃让我死了，我受不住了。”我看见母亲极度痛苦的样子，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想让母亲得到解脱。但我很快冷静下来，理智告诉我决不能这么做！

现在全世界的人都在讨论安乐死，见仁见智，未能达成共识，形成法律。我想，母亲病到这地步，让她平静地死去，才是极大的关爱呀！我在母亲床前站了片刻，父亲就把我叫出去

了。母亲一病数年，日重一日，已经真正病入膏肓，一家人都不抱任何希望了。父亲急于叫我出去，是想跟我亲热一番。儿女在父母心中，永远是心肝宝贝啊！

春节过后，我如期回到学校混日子。我心里明白，这一去将是母子永别。

一九六七年六七月间，家中拍来电报，告知母亲病故。那年只有59岁。

学校处于瘫痪状态，班主任和指导员都被揪出来了，正靠边站呢。我便向学院院长王汝泉请假，告诉他母亲病故，我要回去奔丧。我没有忘记声明母亲是地主分子，表示在思想上要和她划清界限。王院长正在家中午睡，赤膊躺在客厅中的竹床上。他从竹床上懒懒的爬起身，面无表情的点了点头，说：“去吧。”

真好笑。没过几天，他也被揪出来了。罪状中有一条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不知他听了关于划清界限的表白有何感想。

可悲啊，人都死了，还要划清界限！在那个年代，人心都扭曲了。象我们出身不好的人，生怕被认为立场不稳，时时要表白这种政治态度。若要找一个人的麻烦，这类事是最有杀伤力的。

当时南昌武斗激烈，社会一片混乱。军区的头头把枪发给他们支持的那一派，城里常常可以听到枪声，甚至有被流弹击中者，弄得人心惶惶。出于各种考虑，我最后竟然没有归去。

母亲离我而去已三四十年了，但我常常梦见母亲。梦中出现的母亲都是中年的母亲，依然是那么慈祥，那么亲切，使我在梦中依旧能享受那一分深厚的母爱。

随着岁月的流逝，母亲的音容笑貌也变得模糊起来，但有些情景反而越来越清晰。

在我升入初中的那年七月，秋老虎已经过去。我和母亲去小河捞丝草。丝草是作猪食用的。那时村前的小河尚有一人深浅，我晃着水捞着，为自己能来几下狗爬式而自豪。并以为母亲一定在岸上满意地欣赏着，于是，我抬起头，向母亲望去，却见母亲象一尊雕象站立着，遥望远方，似乎在沉思着什么，憧憬着什么，任萧瑟的秋风吹拂那一头仍然乌黑的头发，这情景让我油然产生一种苍凉的美感。多少年过去了，这一刹那间，却象一帧永不褪色的照片印刻在我的脑海中。

母亲没有文化，但不俗，她的气质和内心世界有别于普通的农妇，然而她毕竟是一个农妇。谨以此文表达对母亲的怀念和深深的忏悔。

（上文初稿于一九九四年六月二十六日，后修改）

母亲经常出现在我的梦中，梦中的母亲一点也不老迈。她仍是中年，仍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她一如既往地关爱着我们，我们也仍事事听她指点。梦中的母亲是我心中的母亲。

母亲去世快四十年了。我现在竟忘了母亲离

世的确切日期。她的音容笑貌我真的很陌生了。往事如烟，以至我现在想写一点回忆的文字，都感到没有多少话可说了。

我现在没有母亲任何的遗物。季陶家有一张母亲的头象，是小萍的丈夫董长根根据照片画的，画得还蛮象。画上的母亲，头戴一袭绉纱，胖胖的脸，面带微笑。每回到季陶家，我都会久久地凝望着母亲，追忆母亲的恩情。

继父母

父亲和叔父两兄弟感情深厚，至老不变。叔父没有儿女，父亲一次把又陶和我两个儿子过继给他，并上了村谱。那时五弟还未出生，四个儿子，两兄弟平分，这是少有的事。不过父亲另有特殊的想法。他晚年才说出了真相：祖父有两兄弟，兄长早夭，长子过长房，父亲已经过继给了祖父的夭兄，只有叔叔才是祖父的儿子了。如果父亲过继一个儿子给叔叔，如果又夭折的话，祖父这一支又绝了。为了保险，一次过继两个给叔叔。可见父亲为人的谨慎。叔父享年八十五岁

在农村，上了谱就等于有了法律效应，被过继的人必须接受。又陶曾和我开玩笑说，父亲真大方，害得我们做了两个人的崽，负担两个父

母的后事，而遗产又全没有。

解放前，父亲和叔父长期在外谋生，解放后两人又劳改多年，所以他们一直没有分家，维持到1962年。在我的记忆中，一个十多口人的大家庭，彼此相亲相爱，共度难关，很少发生争吵的事，实属不易。

后来到了三年困难时期，粮食紧张，常常饿得不行，家里就难免会发生矛盾。那时姐姐在税务局管伙食，常会从她单位食堂偷偷的弄一些粮票寄回家。当时对家里是个极大的支援。母亲认为粮票是女儿寄回来的，不是大家庭的，有时，也只是少数几次，瞒着叔婶煮饭吃。有一次，母亲偷偷煮了一茶缸饭，让又陶躲在一个角落里吃。母亲是心痛又陶是家里主要劳动力，最辛苦。而婶婶本来就常常提防着母亲会撇开他们夫妻俩，总是留心观察着。当又陶正在吃饭的时候，被她捉个正着。她非常伤心的哭诉起来：“你们真狠心啊，我倒不要紧，看看他们叔叔，饿得走路都走不动了！”不久，我们就分家了。

那时还是干集体，一个10分的工一天只有几毛钱，顶多块把钱的分红，还要到年底才能兑现。除了扣除口粮，到年终分不到几个钱，这少量的收入要维持一家人的各种开支，是紧巴巴的。所以家里基本上没有存款。

而我们家早在土改时就变得一贫如洗，除了几件农具，几套换洗衣服，此外就没有什么财产

了。

所谓分家，不过是另起一个炉灶。

分家是父亲和叔父两兄弟分家。按理，我和又陶过了继，就要跟叔婶过。但当时的情况是，伯陶已结了婚，眼看就要分出去，我正在读书，季陶还小。又陶若和叔父一起吃，父亲劳动力弱，维持不了一个家。父亲和叔父商定，又陶仍跟父母在一起，秋陶就跟叔叔吃了。

我和叔婶三个人成了一个新家，开始觉得非常别扭。一天晚上，三个人围着一盏煤油灯吃饭，灯光昏暗，气氛萧然，我突然放下碗，站起来说：“我回去吧。”这当儿不小心把煤油灯弄翻，那场面几乎让叔婶流眼泪了。

但最终还是跟他们过下去。既然过继在他们名下，只好认了。实际上1962年下半年我就在外读书，后来又在外工作，回来不过做客一样。

从1962年到婶婶2001年去世，我和他们在一起生活了四十年。

叔父叫王乘殷，字能言。比父亲小两岁。我们从来都是喊他叔叔，没有喊过爸爸。

解放前，叔父一直在外头。他曾经在景德镇多年，在专员公署做文秘一类的差事。常听婶婶夸他翻电报翻得快，很得上司赏识。那时他允许配一个勤务员。城上村张焕衡就是他带到景德镇的，后来在那里替他找了个老婆回来。焕衡的女人和婶婶是老乡。叔父回来当乡长

的时候，又顾了焕衡在乡里养马。解放后，我们家倒了霉，而焕衡评为贫农，他们夫妇暗中会关照叔婶。

焕衡不知什么时候瞎了一只眼，后来死于癌症，我陪婶婶去看过他。一个膝盖烂了一个深深的洞，十分吓人。焕衡老婆人高马大，大嗓门，因为出身好，天不怕地不怕。婶婶去他们家，总是躲躲闪闪的。她便大声说：“怕什么！”她和婶婶一样，没有生育过。我曾听她为自己辩护：“我本来也怀过胎，流掉了，后来没去治，才没有生养。不象你（指婶婶）连胎也没怀过。”他们也过继了一个儿子，叫友根，和我同过学，关系不错。后来因为和媳妇合不来，焕衡老婆吃药水自杀了。

叔父的原配据说不好看，他不喜欢她，后来到了景德镇，爱上了婶婶，就把原配遗弃了。而祖父开初是坚决不同意的，此事曾引起轩然大波，但生米煮成熟饭，祖父终究没有办法。

叔叔的原配死于肺结核。他们曾生育过一个男孩，二岁多时死于麻疹。后来的婶婶从未生育过。

叔父性情豁达温和，常会讲些幽默的故事。他年轻时好打扮，看重仪表。解放后成了专政对象，受过许多苦，他也能泰然处之。他对大家庭里的事不太过问。

叔父比父亲身体好，他虽然在做了地主后才参加农业劳动，但很快就学会了各种农活。那

时，强劳力以十分记酬，他能吃到七八分或八分半。妇女满分是六分，婶婶能吃三分半。父亲连个妇女也不如，也只能吃三四分。

叔婶一直负担我读书，不过只是一部分。除叔婶之外，从高中到大学，每个学期的学费还由姐姐和兄弟们一起负担。父亲怎么说大家就怎么办。从没有谁表示不愿意，或说半句闲话。父亲是主心骨，他自己甚至不能养活自己，说话还是不能不听。

叔父曾有严重的胃病，常年发作。有一次被送往县院，医生决定开刀。父亲坚决反对。因为那时叔父情况不好，担心死在手术台上。结果住了那次院后，胃病居然未发过。晚年气管炎厉害，好在甲正是乡村医生。一发就打氨苄青霉素，病情很快就缓解。

叔叔最后的几年，不能劳动了，在家的几兄弟就帮他们耕种了责任田，帮他们收割进屋。除了留足口粮，还有一定的零用钱。后来叔叔去世，我每年寄回一二千元给婶婶，使她衣食无忧。

我和又陶对叔婶尽了一个儿子的责任。几个侄子也对他们照顾得不错。村里人议论说，雅言两公婆生了五个儿子，自己没享到福，倒让能言两公婆享了福。说得没有错。

叔婶住的地方和梅陶家只隔几步，那几年，一到冬天，叔婶常上梅陶家烤火。后来几乎每天都去，每天都是座上宾。梅陶的继母须早早烧

好火等他们去，叔婶似乎当仁不让。他们没想到这样不妥。终于有一天婶婶和梅陶的继母闹翻了。口角中，婶婶竟说，我们是来侄子家烤火，有什么烤不得！并点出梅陶继母年轻时那些不检点的风流事。她们本来一向感情深厚，嫂嫂长嫂嫂短，叫得非常亲热。这样一来两个老人变得跟死敌一般。叔婶住的房子是梅陶家的，于是叔叔写信给我，说房子不好住，建议买点房子，以便将来我们退休后也有个住的地方。

我提起这件往事，是因为体会到，人往往一辈子不懂事。

叔父弥留之际，婶婶、又陶和我都守在病床旁边。他呼吸困难，躁动不安，极端的痛苦，他拼着命连喊几句：“又陶，快从门背拿根棍子敲我一下，快去呀，快去呀，……”我们让他躺下去，他不肯，于是赶快把他扶下床，让他靠在一条长凳上坐着，又陶和我在两边扶着他，他含糊的嗫嚅着，声音越来越小，慢慢地没有气力了，呼吸也渐渐弱了，过几分钟才断了气。终年86岁。

长辈中，我只给祖父、祖母、叔叔和岳父送了终。

婶婶比叔叔小10岁，嫁给叔叔的时候才17岁。

婶婶很漂亮，据说当年她初到白港的时候引起过轰动。她叫许秀庄，她的容貌一如其

名，个子不高不矮，既秀气又端庄，即使人到中年，风吹雨淋，在村里还是很出众。她80岁过世的时候，还保留着一口洁白的牙齿。这是她断气后，二哥从地上抱她起来时发现的。

老一辈的人都说她是妓女出身，其实是误传，使她一辈子背着黑锅却还蒙在鼓里。父亲来桃溪小住的那一次，曾经向我详细介绍过她的身世。父亲说，她虽然没有生养，但在我们家几十年，你们将来应该善待她。

婶婶是景德镇人，一家生活在一个小镇上。她父亲叫许家女，是卖豆腐的，不过小本生意而已。只此一个独生女，因而领养了一个儿子。父亲和叔叔那时在五区专署做事，驻地就在小镇附近。叔叔当年才二十六七岁，皮鞋擦得锃亮，头发梳得溜光，一副公子哥儿的派头。有人就提醒父亲说，一个人，好吃的就一定死懒，好打扮的就一定爱嫖。你看你弟弟，一定有相好的了。但这种事做哥哥的也劝阻不了。叔叔是有家室的人，并且已有一个儿子。所以，他把婶婶带回家时，引起轩然大波。因为在那个时代，这是有辱门风的，开始祖父高低不答应，但终因生米煮成熟饭，最后只好认了。后来，发妻嫁到附近的石下村，不久就因肺病死了，两岁多的儿子也死了。

婶婶嫁到白港后，仅在1957年回波阳老家一次，那时叔叔尚在北大荒劳改。当时四类份子出县要经乡政府批准。婶婶去请假时，乡长王彩

凤考虑到婶婶才三十五六岁，有可能不再回来，这样叔叔或许要打一辈子光棍，所以托人问过祖父是否同意。在那种时候，彩凤会想到这一点，表现了他的善良的一面。而祖父当然也十分担心，但若拒绝，在情理上说不过去。只好同意了。

据说老家有一个当过团长的鳏夫愿意娶婶婶，父母和亲友也都劝婶婶不要再回白港做地主婆了。但婶婶觉得这样对不起叔叔，还是毅然回来了。后来，阶级斗争没完没了，因此她常叨念着说，要是那年没有回来多好。

好不好谁又知道呢？命运是由上帝安排的。直到九十年代，叔婶每隔一两年都会和景德镇通信，叙叙家常。那边的信是弟弟（按理我们该称舅舅）写的，字歪歪扭扭，家景依然贫寒。这边是叔叔执笔。后来，儿孙辈出了好几个大学生中专生，是他们得意不过的时候了。所以婶婶想回去走走，但叔叔没有同意。他说，父母已不在，弟弟又不是亲弟弟，一别数十载，空手回去能有人理你吗？最终因为钱的问题，婶婶未能如愿。

婶婶从未生育过，做为女人，这是最大的不幸。据说，每当母亲生了孩子，上下一片喜气洋洋的时候，只有她向隅而泣。

婶婶有点小心眼，爱钻字眼生闷气。也有几分虚伪。全家人都说她难说话。就她的境况，比较敏感一点是可以理解的。我觉得家人对她

有些偏见。

老人家一辈子还是老老实实做人的。

2001年7月中旬，甲正来电话，告之二婆病重。我当天即赶回去，诉上腹痛，黄疸很深，心窝部和右腰腹部都有包块，我考虑是胰腺癌，并且已有转移。因天气酷热，同时觉得诊断基本明确，就没有送去县城检查，仅嘱甲正给予支持疗法，以尽人事。至11月19日去世，离80周岁还差几天。期间，我回家看望多次，后来她瘦得十分吓人。

本来还可以拖几天，因她一人另住，夜里无人陪伴，不幸出了意外。享年八十岁。

那天（11月19日）早晨，又陶送饭去时，发现她倒在地上，断了气了。原来她床前一直放着一条长凳，难过的时候，她会坐在床沿，在凳子上靠一靠。又陶去时，凳子倒了，她可能就这样随着凳子倒下去的。

叔叔去世后，婶婶还活了五六年。这期间，我每年都会寄回去一千多元钱，每年都会去看她一两次，送些食物、药品和补品回去。其他兄弟也常会去关照她，病了有甲正为她治疗。最后病重的时候，有又陶、季陶、梅陶，轮流照顾她的衣食起居。他们既是尽一个侄子的义务，也是看我的面子。

所以，婶婶虽然没有亲生儿女，但她晚年衣食无忧，胜过有儿有女的人。不是说我对她有多深的感情，我只是觉得应该尽一个继子的义

务。

她对我的感情是深厚的，她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我没有辜负她。

我所内疚的是，没有送她去县里做个B超，确诊一下。

临死的时候，她还觉得自己的日子有多长，还向我要钱（此前她自知不起，已将存折交给我了），说怕要用钱的时候，我明知她身上还有些钱，况且她再也没有用钱的机会了，就没有满足她。她虽没有做声，但我看出她的不满。后来我想，不该伤了一个濒死者的心，想起来很自咎。

病重的时候，她几次向我说，想吃热壳子（就是荔枝），这本来是不难做到的，结果我也没有买。

这几件事常让我耿耿在心。所以，我想，该做的事一定要做，否则，会遗憾终生的。

婶婶去世的时候，存折上还有几千块钱，都是我陆续寄回去的。除了用于丧葬，我给了一千元梅陶，作为这么多年住他们房子的房租。剩下的部分几兄弟各分了几十元。

兄弟有约，叔婶的丧葬费用是要我们四兄弟（除梅陶）分担的。但我考虑到，我长年在外，平日的照顾全靠在家的兄弟，所以，婶婶的生活费、医药费和丧葬费应该由我来承担，最后也确实都是我出的。罗米也表示理解。

据孙媳友兰说，婶婶病中，几个侄媳没有谁去

看过一次（小星可能去过），如果真是这样，老人家有什么地方使她们这么无情？我不理解。不要说是长辈，就是朋友，患难与共几十年，生离死别，也应该去看一眼啊。

第二章经历改朝换代的童年

該內容沒有包含在樣本書中。您可以在 Leanpub 上購買這本書，網址為 <http://leanpub.com/moranhuishou>

一只老鼠大

該內容沒有包含在樣本書中。您可以在 Leanpub 上購買這本書，網址為 <http://leanpub.com/moranhuishou>

最早的记忆碎片

該內容沒有包含在樣本書中。您可以在 Leanpub 上購買這本書，網址為 <http://leanpub.com/moranhuishou>

山雨欲来

该内容沒有包含在樣本書中。您可以在 Leanpub 上購買這本書，網址為 <http://leanpub.com/moranhuishou>

祖宅

该内容沒有包含在樣本書中。您可以在 Leanpub 上購買這本書，網址為 <http://leanpub.com/moranhuishou>

红色恐怖

该内容沒有包含在樣本書中。您可以在 Leanpub 上購買這本書，網址為 <http://leanpub.com/moranhuishou>

这辈子第一次开会就下跪

该内容沒有包含在樣本書中。您可以在 Leanpub 上購買這本書，網址為 <http://leanpub.com/moranhuishou>

祖母让我去卖油斋斋

該內容沒有包含在樣本書中。您可以在 Leanpub 上購買這本書，網址為 <http://leanpub.com/moranhuihou>

田螺换米

該內容沒有包含在樣本書中。您可以在 Leanpub 上購買這本書，網址為 <http://leanpub.com/moranhuihou>

巡回演出故事

該內容沒有包含在樣本書中。您可以在 Leanpub 上購買這本書，網址為 <http://leanpub.com/moranhuihou>

父亲和叔父捉去坐班房了

該內容沒有包含在樣本書中。您可以在 Leanpub 上購買這本書，網址為 <http://leanpub.com/moranhuihou>

祖宗有灵

该内容没有包含在样本书中。您可以在 Leanpub 上购买这本书，网址为 <http://leanpub.com/moranhuihou>

癸巳除夕

该内容没有包含在样本书中。您可以在 Leanpub 上购买这本书，网址为 <http://leanpub.com/moranhuihou>

第三章住廟的日子

該內容沒有包含在樣本書中。您可以在 Leanpub 上購買這本書，網址為 <http://leanpub.com/moranhuihou>

住廟的日子

該內容沒有包含在樣本書中。您可以在 Leanpub 上購買這本書，網址為 <http://leanpub.com/moranhuihou>

中曲多

該內容沒有包含在樣本書中。您可以在 Leanpub 上購買這本書，網址為 <http://leanpub.com/moranhuihou>

禾花鱼

該內容沒有包含在樣本書中。您可以在 Leanpub 上購買這本書，網址為 <http://leanpub.com/moranhuishou>

梅陶把掉了

該內容沒有包含在樣本書中。您可以在 Leanpub 上購買這本書，網址為 <http://leanpub.com/moranhuishou>

能卿说三国

該內容沒有包含在樣本書中。您可以在 Leanpub 上購買這本書，網址為 <http://leanpub.com/moranhuishou>

玻璃少爷

該內容沒有包含在樣本書中。您可以在 Leanpub 上購買這本書，網址為 <http://leanpub.com/moranhuishou>

嬋嬋回娘家

該內容沒有包含在樣本書中。您可以在 Leanpub 上購買這本書，網址為 <http://leanpub.com/moranhuishou>

韩素贞

該內容沒有包含在樣本書中。您可以在 Leanpub 上購買這本書，網址為 <http://leanpub.com/moranhuishou>

城上姑婆

該內容沒有包含在樣本書中。您可以在 Leanpub 上購買這本書，網址為 <http://leanpub.com/moranhuishou>

爸爸回来了

該內容沒有包含在樣本書中。您可以在 Leanpub 上購買這本書，網址為 <http://leanpub.com/moranhuishou>

叔叔也回来了

该内容沒有包含在樣本書中。您可以在 Leanpub 上購買這本書，網址為 <http://leanpub.com/moranhuihou>

发蒙

该内容沒有包含在樣本書中。您可以在 Leanpub 上購買這本書，網址為 <http://leanpub.com/moranhuihou>

亦读亦耕的小学

该内容沒有包含在樣本書中。您可以在 Leanpub 上購買這本書，網址為 <http://leanpub.com/moranhuihou>

大跃进的故事

该内容沒有包含在樣本書中。您可以在 Leanpub 上購買這本書，網址為 <http://leanpub.com/moranhuihou>

吃饭不要钱

该内容沒有包含在樣本書中。您可以在 Leanpub 上購買這本書，網址為 <http://leanpub.com/moranhuihou>

大炼钢铁

该内容沒有包含在樣本書中。您可以在 Leanpub 上購買這本書，網址為 <http://leanpub.com/moranhuihou>

几位老师

该内容沒有包含在樣本書中。您可以在 Leanpub 上購買這本書，網址為 <http://leanpub.com/moranhuihou>

昔年小朋友

该内容沒有包含在樣本書中。您可以在 Leanpub 上購買這本書，網址為 <http://leanpub.com/moranhuihou>

第四章豆芽菜

該內容沒有包含在樣本書中。您可以在 Leanpub 上購買這本書，網址為 <http://leanpub.com/moranhuishou>

全县第一与差点落榜

該內容沒有包含在樣本書中。您可以在 Leanpub 上購買這本書，網址為 <http://leanpub.com/moranhuishou>

这一天我走出了山沟

該內容沒有包含在樣本書中。您可以在 Leanpub 上購買這本書，網址為 <http://leanpub.com/moranhuishou>

巴丘庙

該內容沒有包含在樣本書中。您可以在 Leanpub 上購買這本書，網址為 <http://leanpub.com/moranhuishou>

最难忘的是饥饿

該內容沒有包含在樣本書中。您可以在 Leanpub 上購買這本書，網址為 <http://leanpub.com/moranhuishou>

老师们

該內容沒有包含在樣本書中。您可以在 Leanpub 上購買這本書，網址為 <http://leanpub.com/moranhuishou>

同学们

該內容沒有包含在樣本書中。您可以在 Leanpub 上購買這本書，網址為 <http://leanpub.com/moranhuishou>

第五章不在病中即愁中

該內容沒有包含在樣本書中。您可以在 Leanpub 上購買這本書，網址為 <http://leanpub.com/moranhuishou>

备取生

該內容沒有包含在樣本書中。您可以在 Leanpub 上購買這本書，網址為 <http://leanpub.com/moranhuishou>

这本小册子害我一辈子

該內容沒有包含在樣本書中。您可以在 Leanpub 上購買這本書，網址為 <http://leanpub.com/moranhuishou>

高中生活拾零

該內容沒有包含在樣本書中。您可以在 Leanpub 上購買這本書，網址為 <http://leanpub.com/moranhuishou>

高中毕业证

該內容沒有包含在樣本書中。您可以在 Leanpub 上購買這本書，網址為 <http://leanpub.com/moranhuishou>

老师们

該內容沒有包含在樣本書中。您可以在 Leanpub 上購買這本書，網址為 <http://leanpub.com/moranhuishou>

四十年后的聚会

該內容沒有包含在樣本書中。您可以在 Leanpub 上購買這本書，網址為 <http://leanpub.com/moranhuishou>